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欧洲人权公约第 5 条适用指南
人身自由和安全权

COUNCIL OF EUROPE



CONSEIL DE L'EUROPE

出版商或有关组织希望出版或在网上公布（或翻译）本报告的，请联系 publishing@echr.coe.int，咨询相关信息。

©欧洲理事会/欧洲人权法院, 2014

本报告可于以下地址下载www.echr.coe.int (Case-law – Case-law analysis – Case-law guides)

关于报告发表的最新动态请关注法院的推特账号<<https://twitter.com/echrpublication>>.

本报告由欧洲人权法院研究部提供，对法院没有拘束力。报告的第一版本于 2012 年 6 月发表，第二版本即本报告于 2014 年 6 月完成。报告的翻译在欧洲理事会和欧洲人权法院的安排下进行，由中国人民大学全权负责。

目录

I. 适用范围	5
1) 剥夺人身自由	5
2) 适用标准	5
3) 监狱中采取的措施	6
4) 对乘机者进行安检	6
5) 正式逮捕或拘留之外剥夺人身自由	6
6) 剥夺他人自由的积极义务	6
II. 第 5 条第 1 款下拘留的合法性	7
1) 第 5 条的目的	7
2) 符合国内法	7
3) 对遵循国内法的审查	7
4) 一般原则	7
5) 法律确定性原则	8
6) 禁止任意行为	8
7) 法院指令	9
8) 对决定的论证以及对非任意的要求	9
9) 可接受的程序瑕疵	9
10) 延迟执行释放指令	10
III. 第 5 条第 1 款下授权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形	10
A. 定罪后监禁	10
1) 存在定罪	10
2) 具有管辖权的法院	10
3) 监禁必须在定罪“之后”	11
4) 上诉程序的影响	11
B. 不遵守法院指令或法律义务的拘留	11
1) 不遵守法院指令	12
2) 履行法定义务	12
C. 还押候审	13
1) 逮捕或拘留的目的	13
2) “合理怀疑”的含义	13
3) “违法行为”	14
D. 对未成年人的拘留	14
1) 一般规定	14
2) 教育性监督	14
3) 有关法律当局	15
E. 基于社会和医疗原因的拘留	15
1) 一般规定	15
2) 预防传染病蔓延	15
3) 拘留精神失常者	15
4) 拘留酗酒者和吸毒者	16
5) 流氓	17
F. 拘留外国人	17
1) 为防止某人未经许可进入国境实施的拘留	17
2) 为驱逐出境或引渡实施的拘留	17
IV. 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人应该得到的保障	18
A. 拘留理由 (第 5 条 § 2)	18

1) 可适用性.....	18
2) 目的.....	19
3) 应该向谁提供理由.....	19
4) 应该“及时”提供理由.....	19
5) 提供理由的方式.....	19
6) 需要提供的理由的范围.....	20
7) 使用被逮捕人能够理解的语言.....	20
B. 被立即送交法官的权利 (第 5 条 § 3).....	20
1) 该条款的目的.....	20
2) 及时自动进行司法控制.....	21
3) 恰当的司法人员的性质.....	21
4) 独立性.....	22
5) 程序要求.....	22
6) 实质要求.....	22
(a) 审查拘留的实质内容.....	22
(b) 释放权.....	23
C. 在合理的时间内得到审判或者在审判期间获得释放的权利 (第 5 条第 3 款).....	23
1) 需要考虑的期限.....	23
2) 一般原则.....	23
3) 继续拘留的理由.....	24
4) 特殊注意.....	25
5) 替代措施.....	25
6) 保释.....	25
7) 拘留期的合理性.....	26
8) 对未成人的审前拘留.....	26
D. 要求法庭迅速审查拘留合法性的权利 (第 5 条第 4 款).....	26
1) 条款目的.....	26
2) 所要求的审查的性质.....	26
3) 程序保障.....	28
4) 要求“迅速”.....	28
(a) 需要考虑的期间.....	29
(b) 评估速度需要考虑的相关因素.....	29
E. 因非法拘留得到赔偿的权利 (第 5 条第 5 款).....	29
1) 适用性.....	30
2) 司法救济.....	30
3) 赔偿的可获得性.....	30
4) 赔偿的性质.....	30
5) 损害的存在.....	30
6) 赔偿的数额.....	31
援引案例一览.....	32

I. 适用范围

第 5 条 – 人身自由和安全权

“1. 任何人都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权。除了在下述情况下并遵循法律所规定的程序，任何人的自由不被剥夺...”

1) 剥夺人身自由

1. 第 5 条捍卫自由权，维护的是个人的人身自由；其目的是为了保证任何人的自由不被任意剥夺。它并不仅仅关注第 4 议定书第 2 条中涉及的限制行动自由的内容 (*Creangă v. Romania* [GC], § 92; *Engel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 58)。

2. 严重限制行动自由而落入第 5 条第 1 款的范围和只受限于第 4 议定书第 2 条的单纯限制行动自由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强度不同，并不是性质或实质上的不同 (*Guzzardi v. Italy*, § 93; *Rantsev v. Cyprus and Russia*, § 314; *Stanev v. Bulgaria* [GC], § 115)。

3. 剥夺人身自由不只限于典型的拘留和定罪后进行拘留的案件，也可能通过很多不同的形式发生 (*Guzzardi v. Italy*, § 95)。

2) 适用标准

4. 法院认为其不受国内机构的法律推论的约束，在是否存在剥夺人身自由这一问题上，法院自主评估案件的情况 (*H.L. v. the United Kingdom*, § 90; *H.M. v. Switzerland*, §§ 30 and 48; *Creangă v. Romania* [GC], § 92)。

5. 为了决定是否在第 5 条规定的“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形，分析的起点应该是涉案人的具体情况，应该考虑的因素包括涉案行为的类型，持续期间，影响和方式 (*Guzzardi v. Italy*, § 92; *Medvedyev and Others v. France* [GC], § 73; *Creangă v. Romania* [GC], § 91)。

6. 条文要求对所采取的限制性措施的“类型”以及“实施方式”进行考虑。这能够使法院考虑到与监禁之外的措施相关的特定背景与情况。事实上，由于很多情况发生在现代社会，民众们被要求为了公共利益而对限制自由迁徙或者限制自由的措施进行容忍，因此所采取的措施的背景是一项重要的考量因素。

7. 第 5 条第 1 款下“剥夺人身自由”这一概念的意义包括客观因素，即在一段不可忽视的时间内个人被控制在相对限制的空间内，还包括另一个主观因素，即上述个人并没有对此限制表示有效地同意。 (*Storck v. Germany*, § 74; *Stanev v. Bulgaria* [GC], § 117)。

8. 应考虑的客观因素包括：离开限制区域的可能性，监视和控制个人行动自由的程度，隔离的程度和社会交往的可能性 (可参见 *Guzzardi v. Italy*, § 95; *H.M. v. Switzerland*, § 45; *H.L. v. the United Kingdom*, § 91; and *Storck v. Germany*, § 73)。

9. 当事实表明存在第 5 条第 1 款下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形时，相对较短的拘留期间并不影响上述结论 (*Rantsev v. Cyprus and Russia*, § 317; *Iskandarov v. Russia*, § 140)。

10. 即使行为持续时间较短，在警察行使搜查和限制的权力时存在“强迫”的因素即为剥夺人身自由的表现。 (*Foka v. Turkey*, § 78; *Gillan and Quinton v. the United Kingdom*, § 57; *Shimovolos v. Russia*, § 50; and *Brega and Others v. Moldova*, § 43)。

11. 一个人没有被戴上手铐送入监狱或受到人身限制，并不构成存在剥夺人身自由的决定性因素 (*M.A. v. Cyprus*, § 193)。

12. 人身自由这一权利在民主社会中十分重要以至于个人不能仅仅基于一个简单理由就丧失《公约》对这方面的保护，即他可能愿意接受拘留，特别是当这个人从法律上讲无法做出同意或不同意的行为时。 (*H.L. v. the United Kingdom*, § 90; *Stanev v. Bulgaria* [GC], § 119)。

13. 一个人缺乏法定资格的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或她不能明白或同意自己所处的情况 (*Shtukaturov v. Russia*, §§ 107-109; *Stanev v. Bulgaria* [GC], § 130; *D.D. v. Lithuania*, § 150)。

3) 监狱中采取的措施

14. 在监狱中采取的纪律措施对拘留的条件产生影响的，并不构成“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形。在正常情况下，该项措施应该被视为对合法的拘留条件进行了修改，并且不属于第5条第1款的范围内 (*Bollan v. the United Kingdom* (裁定))。

4) 对乘机者进行安检

15. 在机场进行边境检查时，乘客被边检人员拦住，对自己的情况进行说明，拘留时间并未超过严格符合相关程序的时间时，并不产生适用《公约》第5条的问题。

5) 正式逮捕或拘留之外剥夺人身自由

16. 在下列不同情况中均产生了第5条的适用问题：

- 将个人安置在精神或社会医疗机构 (参见, 在许多其他机构中, *De Wilde, Ooms and Versyp v. Belgium*; *Nielsen v. Denmark*; *H.M. v. Switzerland*; *H.L. v. the United Kingdom*; *Storck v. Germany*; *A. and Others v. Bulgaria*; *Stanev v. Bulgaria* [GC]);
- 在机场过境区的限制 (*Amuur v. France*; *Shamsa v. Poland*; *Mogos and Others v. Romania* (裁定); *Mahdid and Haddar v. Austria* (裁定); and *Riad and Idiab v. Belgium*);
- 在警察局的询问 (*I.I. v. Bulgaria*; *Osypenko v. Ukraine*; *Salayev v. Azerbaijan*; *Farhad Aliyev v. Azerbaijan*; and *Creangă v. Romania* [GC]);
- 被警方拦截并搜查 (*Foka v. Turkey*, *Gillan and Quinton v. the United Kingdom*, and *Shimovolos v. Russia*);
- 因社会治安的原因警方采取措施控制人群 (*Austin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软禁 (*Mancini v. Italy*; *Lavents v. Latvia*; *Nikolova v. Bulgaria* (no. 2); and *Dacosta Silva v. Spain*)。

6) 剥夺他人自由的积极义务

17. 第5条第1款第1句，规定国家对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权承担积极义务。这不仅要求国家不积极侵犯相关权利，而且要求国家采取合理措施，禁止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任何人违法干预这些权利 (*El-Masri v.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GC], § 239)。

18. 国家因此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弱势群体，包括相关国家机构在其知道或应该知道上述情况时应该采取合理措施防止发生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形 (*Storck v. Germany*, § 102)。

19. 国家应对其默许私人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或者无法终止上述情形承担责任(*Riera Blume and Others v. Spain*; *Rantsev v. Cyprus and Russia*, §§ 319-321; *Medova v. Russia*, §§ 123-125)。

II. 第 5 条第 1 款下拘留的合法性

1) 第 5 条的目的

20. 第 5 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任意或不合法地剥夺个人人身自由 (*McKay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30)。人身自由和安全权是在《公约》所指称的“民主社会”中最为重要的元素 (*Medvedyev and Others v. France* [GC], § 76; *Ladent v. Poland*, § 45, 18 March 2008)。

21. 法院因此认为未经许可拘留他人是对《公约》第 5 条中所重点保护的权利的绝对否认并且体现了严重违反该条规定的行为。缺乏关于拘留日期、时间、地点、被拘留人姓名、拘留原因和受拘留影响人的姓名的记录，是与《公约》第 5 条目的相违背的(参见 *Kurt v. Turkey*, § 125) 这也和《公约》要求的合法性不符 (*Anguelova v. Bulgaria*, 同上)。

2) 符合国内法

22. 为了满足合法性的要求，拘留必须“遵循法定程序”。这表示拘留必须和国内法中的相关实质和程序条款相符(*Del Río Prada v. Spain* [GC], § 125) (或者相关的国际法，参见，*Medvedyev and Others v. France* [GC], § 79; *Toniolo v. San Marino and Italy*, § 46)。

23. 例如，法院认为当国家机关未在法定时间提出延长拘留时间的申请时便违反了《公约》第 5 条 (*G.K. v. Poland*, § 76)。相反，违反关于不同种罪行而应采取不同方式询问的通知，却不会使之后的拘留和拘留失去国内法依据 (*Talat Tepe v. Turkey*, § 62)。

3) 对遵循国内法的审查

24. 虽然通常国家机构特别是法院，负责解释和适用国内法，但是当违反国内法的同时也违反了《公约》，那么情况会有所不同。当涉及可能违反第 5 条第 1 款的情况时，法院必须行使一定的权力来审查国内法是否被遵守。(参见，*Creangă v. Romania* [GC], § 101; *Baranowski v. Poland*, § 50; *Benham v. the United Kingdom*, § 41) 在这一过程中，法院必须考虑相关时间的法律情况。(*Wloch v. Poland*, § 114)。

4) 一般原则

25. 合法性的要求并不仅仅意味着符合相关的国内法；国内法本身需要与《公约》相符，包括《公约》规定的一般原则或暗指的原则 (*Plesó v. Hungary*, § 59)。

《公约》暗指的原则在第 5 条第 1 款判例法下意味着法治原则，以及与其相关的法律的确切性，比例性原则以及《公约》宗旨所提倡的防止任意性的原则([Simons v. Belgium \(dec.\)](#), § 32)。

5) 法律确定性原则

26. 当涉及剥夺人身自由时，满足法律确定性的一般原则尤为重要。因此，国内法应明确界定剥夺人身自由的条件，而且相关规定应该在适用上具有可预见性，从而满足《公约》规定的“合法”标准，这个标准要求所有法律都应该足够明确，从而使公民，在必要时辅以适当的建议，能在一定合理的程度内预见某一特定的行为在相关情况下会产生的后果（参见最近的案例，[Del Río Prada v. Spain \[GC\]](#), § 125; [Creangă v. Romania](#), § 120; and [Medvedyev and Others v. France \[GC\]](#), § 80）。

27. 例如，在缺乏国内立法或判例法的特别规定的前提下就依据起诉书将某人拘留则违反了《公约》第 5 条第 1 款（[Baranowski v. Poland](#), §§ 50-58）。在缺乏明确的立法基础的前提下，自动重新开始审前拘留同样违反《公约》第 5 条第 1 款([Svipsta v. Latvia](#), § 86)。对比而言，在没有下发正式的拘留令的前提下，依据 indictment Chamber 下达的指令，为了进行进一步调查而继续拘留某人并未表明违反了上述条款（[Laumont v. France](#), § 50）。

28. 国内机构关于某一法律条文不一致的，甚至互斥的解释和适用，同样不符合《公约》要求的“法律质量”的标准（[Nasrulloev v. Russia](#), § 77; [Ječius v. Lithuania](#), §§ 53-59）但是，在缺乏判例法的时候，法院并不会对国内法进行解释。因此，也不愿认为国内法院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参见 [Wloch v. Poland](#), §§ 114-116; [Winterwerp v. the Netherlands](#), §§ 48-50）。

29. 尽管外交言论是国际法的一种渊源，在这种言论的基础上拘留相关人员在《公约》第 5 条第 1 款下是不合法的，只要它并不确切也没有足够的可预见性。尤其是在关于可能拘留和拘留相关人员问题上缺乏确切的规定时，将会触犯第 5 条第 1 款对法律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的要求（[Medvedyev and Others v. France \[GC\]](#), §§ 96-100）。

6) 禁止任意行为

30. 此外，任何对人身自由的剥夺都应该以坚持保护个人免于任意决断为目标（参见，[Witold Litwa v. Poland](#), § 78）。

31. 第 5 条第 1 款中“任意”的概念与国内法的规定存在出入，因此剥夺人身自由在国内法下合法时也可能是任意的，与《公约》相违背的（[Creangă v. Romania](#), § 84; [A.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 164）。

32. 根据拘留的形式不同，任意的概念也存在不同。本法院已经指出，当政府机构怀有恶意或欺骗之意时，任意就可能产生。在这种情况下拘留令以及执行拘留的指令未被第 5 条第 1 款分段的限制性规定。拘留的地点和条件并不符合允许剥夺自由的情况。同时，拘留行为也不符合比例原则（主要原则的详细规定：[James, Wells and Lee v. the United Kingdom](#), §§ 191-95; and [Saadi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68-74））。

33. 一国法院取代已过期的或有缺陷的拘留令的速度，也是分析拘留决定是否任意的另一个因素。（[Mooren v. Germany \[GC\]](#), § 80）因此，法院认为在第 5 条第 1 款第 3 项的背景下，从最初的拘留令过期到上诉法院将案件发回下级法院重审后重新颁发新的、合理的拘留令中间少于一个月的，不能认为是对当事人的任意拘留（[Minjat v. Switzerland](#), §§ 46 和 48）。相反，上诉法院将案件发回下级法院重审后超过一年时间的，在此期间当事人处于一种对于其还被关押候审情况感到不确定的状态，再加上下

级法院重新审查其拘留没有一定的时间限制，这种拘留决定应被认为是任意的(参见 *Khudoyorov v. Russia*, §§ 136-37)。

7) 法院指令

34. 原则上，依据法院指令进行一段时间的拘留是“合法”的。国内法院可能认定一个依据后来被上级法院判定为不合法的指令而实施的拘留有效 (*Bozano v. France*, § 55)。即使国内法院认为拘留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根据“法律规定的程序”，仍然可能会继续进行拘留(*Erkalo v. the Netherlands*, §§ 55-56)。因此，拘留令中存在的缺陷并不必然使得该拘留期间违反第 5 条第 1 款 (*Yefimenko v. Russia*, §§ 102-08; *Ječius v. Lithuania*, § 68; *Benham v. the United Kingdom*, §§ 42-47)。

35. 法院区分两种行为，一种是国内法院在其管辖权下的行为，而另一种是超越管辖权的行为 (*ibid.*, §§ 43 et seq.)。当利益相关人没有收到适当的开庭通知的情况下，拘留明显是不合法的 (*Khudoyorov v. Russia*, § 129)。国内法院没有按照国内立法的规定进行相关的询问(*Lloyd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 108 and 116)，或者下级法院没有适当考虑可代替拘留的其他方法 (参见以上, § 113)。另一方面而言，当没有证据证明国内法院的行为达到“严重或明显的违反规则”的程度时，法院认为拘留是合法的 (参见以上, § 114)。

8) 对决定的论证以及对非任意的要求

36. 缺乏对拘留令进行的论证或对其论证不充分是法院在第 5 条第 1 款下评估拘留合法性时会考虑的因素。因此，司法机关在授权延长拘留时间的决定中缺乏相应的依据和推理的，可能被视为与第 5 条第 1 款中保护免受任意的原则相冲突 (*Stašaitis v. Lithuania*, §§ 66-67)。同样，一个极其简短的且未提及任何法律条款的拘留决定也无法为免受任意行为提供充足的保护 (*Khudoyorov v. Russia*, § 157)。

37. 然而，当国内法院认为对申诉人的拘留有足够的国内法依据时，即使在相关的拘留令中没有提及拘留的原因，本法院仍可能认为对申诉人的拘留符合国内法 (*ibid.*, § 47)。另外，国内法院撤销缺乏论证和原因说明的拘留令，但仍然认为对申诉人的拘留有一定的依据的情况下，这时拒绝释放被拘留人并且将拘留合法性的决定发回下级法院重审的，并不违反第 5 条第 1 款 (*Minjat v. Switzerland*, § 47)。

38. 《公约》要求拘留令应当具备具体的依据并且对拘留的时间限制进行明确规定 (*Meloni v. Switzerland*, § 53)。另外，相关机关应该考虑除拘留之外其他侵略性较弱的方法 (*Ambruszkiewicz v. Poland*, § 32)。

9) 可接受的程序瑕疵

39. 下列程序瑕疵不会使对申诉人的拘留违法:

- 根据判例法，在个别情况下，如果有关机关真实地相信已经向申诉人下达了拘留令，那么在实际没有将拘留令正式地下达被告的情况下，并不构成“严重地或明显地违反规定”的行为 (*Maturana v. Italy*, § 79; 但是在 *Voskuil v. the Netherlands* 案中，法院认为未能在法律规定的时间 (3 天而不是 24 小时) 内下达拘留令是违反《公约》的行为);
- 仅存在于逮捕令或拘留令上的文书错误，后来经过了司法机关修正的情况 (*Nikolov v. Bulgaria*, § 63; *Douiyeb v. the Netherlands* [GC], § 52);

- 根据在法庭上披露的事实而对之前对申诉人作出拘留决定的依据进行更改的情况 (*Gaidjurgis v. Lithuania* (裁定))。如果对更改依据的行为未能提供足够的理由, 法院可能会认为更改依据的行为违反了第 5 条第 1 款 (*Calmanovici v. Romania*, § 65)。

10) 延迟执行释放指令

35. 一个奉行法治的国家不能容忍法院已经下达释放指令但还有人的的人身自由被剥夺(*Assanidze v. Georgia* [GC], § 173)。但是法院认为延迟执行释放决定是可以理解的甚至经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国内当局必须尽量降低延迟释放的时间(*Giulia Manzoni v. Italy*, § 25)。延迟 11 个小时才执行对申诉人的释放指令违背了《公约》第 5 条第 1 款 (*ibid.*; *Quinn v. France* §§ 39-43)。

III. 第 5 条第 1 款下授权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形

A. 定罪后监禁

第5条第1款(a)

“1. 任何人都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权。除了在下列情况下并遵循法律所规定的程序, 任何人的自由不被剥夺:...

(a) 由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定罪后进行的合法拘留

1) 存在定罪

41. 第 5 条第 1 款适用于任何“定罪”后, 由法院宣布剥夺人身自由, 而且不区分当事人犯下的罪行应属于刑事犯罪还是一国内部法律中的纪律处分的情形(*Engel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 68; *Galstyan v. Armenia*, § 46)。

42. 该术语意味着发现了罪行并通过惩罚或采取其他措施剥夺人身自由 (*Del Río Prada v. Spain* [GC], § 125; *James, Wells and Lee v. the United Kingdom*, §189; *M. v. Germany*, § 87; *Van Droogenbroeck v. Belgium*, § 35; *B. v. Austria*, § 38)。

43. 该条文并不禁止缔约国执行由其领土外具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监禁决定 (*X v.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1963 年 12 月 14 日, 委员会决定)。尽管缔约国并没有义务审核定罪程序是否符合《公约》第 6 条下的所有要求 (*Drozdz and Janousek v. France and Spain*, § 110), 但定罪不能公然违反正义 (*Ilaşcu and Others v. Moldova and Russia* [GC], § 461; *Stoichkov v. Bulgaria*, § 51)。如果定罪的程序“明显地违背第 6 条的规定或者违背了其中的原则”, 那么根据第 5 条第 1 款(a) 的规定, 剥夺人身自由的果并不正当(*Willcox and Hurford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 95)。

2) 具有管辖权的法院

44. “法院”这一术语不仅是指那些具有独立于行政机关和案件当事人, 并能保证遵循诉讼程序这样特征的机构 (*Weeks v. the United Kingdom*, § 61; *De Wilde, Ooms and*

[Versyp v. Belgium, § 78](#))。每个需要法院介入的案子中的诉讼程序不需要都完全一样。为了确定某一诉讼程序是否提供了充足的保障，法院应该注意考虑该诉讼的具体情形的性质(同上注)。

45. 另外，相关机构不应该只有提供建议的职能，而且必须有一定的职权来决定监禁的合法性并能在监禁不合法时作出释放决定 ([X. v. the United Kingdom, § 61](#); [Weeks v. the United Kingdom, § 61](#))。

46. 如果某个法院并非依据“法律而建立”，那么该法院就是不“具有职权的”([Yefimenko v. Russia, §§ 109-11](#))。

3) 监禁必须在定罪“之后”

47. “之后”一词并不仅仅意味着在时间上监禁必须在定罪之后。除此之外，监禁必须源于“定罪”，随着并依附于“定罪”而发生。简而言之，定罪和剥夺人身自由之间要存在充分的因果关系 ([Del Río Prada v. Spain \[GC\], § 124](#); [James, Wells and Lee v. the United Kingdom, § 189](#); [Monnell and Morris v. the United Kingdom, § 40](#))。

48. 然而，如果不予以释放并重新监禁的决定（包括延长预防性监禁）与立法目的以及法院目的无关，或者基于对这些目的的不合理分析而做出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因果关系会逐渐变弱，也可能最后被切断。在这些情况下，一开始合法的拘留会成为任意剥夺人身自由，并违反第 5 条规定的行为([Del Río Prada v. Spain \[GC\], § 124](#); [H.W. v. Germany, § 102](#); [M. v. Germany, § 88](#)，关于延续预防性监禁)。

49. 对“定罪以后”这一术语的解释不能限制解释为“最后的定罪”。因为这样会排除对那些在审判过程中依然享有自由嫌疑人进行逮捕。在上诉或审查过程中，根据第 6 条的要求，当事人的罪行已在审判中确立，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 ([Wemhoff v. Germany, § 9](#))。

50. 第 5 条第 1 款第一项适用于精神不健全的人一经定罪被拘禁于精神病院 ([X. v. the United Kingdom, § 39](#))。但它并不适用于无罪释放后的情形([Luberti v. Italy, § 25](#))。

4) 上诉程序的影响

51. 一定期间的拘留如果是根据法院指令的，理论上来说是合法的。之后法院裁定在作出上述决定时出现法律适用或解释上的错误，并不必然地追溯性地影响相应拘留的合法性。本法院拒绝支持被一审法院定罪但上诉法院裁定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有误的申诉人的申请 ([Benham v. the United Kingdom, § 42](#))。如果拘留没有国内法依据或是任意的，则该拘留是不合法地 ([Tsirlis and Kouloumpas v. Greece, § 62](#))。

B. 不遵守法院指令或法律义务的拘留

第 5 条 § 1(b)

“1. 任何人都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权。除了在下述情况下并遵循法律所规定的程序，任何人的自由不被剥夺:...

(b)“由于不遵守法院合法的命令或者为了保证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任何义务而对某人予以合法拘留或拘留;”

1) 不遵守法院指令

52. 第 5 条第 1 款 b 项中的用语意味着被逮捕或拘留的人有机会遵守法院的命令但他/她并没有这么做 (*Beiere v. Latvia*, § 49)。

53. 如果未经告知, 个人不为不遵守法院指令的行为负责(同上, § 50)。

54. 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做出指令前, 某人拒绝接受特定的措施或者拒绝遵守特定的前置程序的行为在判断是否符合法院指令时并不具有推断价值 (*Petukhova v. Russia*, § 59)。

55. 国内当局应对自由权的重要性的保证法院指令在民主社会被执行的重要性中作出衡量。应该衡量的因素包括法院指令的目的, 遵守法院指令的可行性, 拘留的时间长度。比例性原则的衡量保证了在整体中特定因素的重要性 (*Gatt v. Malta*, § 40)。

56. 法院已在一些案子中适用《公约》第 5 条第 1 款 b 项, 例如, 未及时付清法院罚款的案子 (*Airey v. Ireland*, Commission decision), 拒绝进行精神健康检查的案子 (*X v.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0 December 1975), 或者拒绝进行法院指令的血液监测的案子 (*X v. Austria*, Commission decision), 拒绝遵守居留限制的案子 (*Freda v. Italy*, Commission decision), 拒绝遵守法院作出的将孩子交还给父母的决定 (*Paradis v. Germany* (裁定)), 拒绝遵守签保令的案子 (*Steel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违反保释条款的案子 (*Gatt v. Malta*) 和拘留在精神病院的案子 (*Beiere v. Latvia*, cited above, 拘留决定被认为是“法院的合法命令”)。

2) 履行法定义务

57. 第 5 条第 1 款 b 项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允许在保证履行任何法定义务时进行拘留。因此被拘留的人必须未履行特定义务, 而且拘留和拘留必须以保证义务履行为目的, 而不是以惩罚为目的。只要相关义务已被履行, 那基于第 5 条第 1 款 b 项进行拘留的法律基础便不复存在 (*Vasileva v. Denmark*, § 36)。

58. 未履行的义务必须是特定的和具体的 (*Ciulla v. Italy*, § 36)。在这一点上的扩大解释会造成与法治不相符合的后果 (*Engel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 69; *Iliya Stefanov v. Bulgaria*, § 72)。

59. 只有在犯罪行为迫近时, 犯罪地点和时间以及潜在的受害人都十分特定时才能认为不进行刑事犯罪的义务是“特定且具体”的。不实行某事的义务与进行特定行为的义务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在判定某人未能履行其义务之前, 他/她有必要意识到特定的行为不应该被实行, 并且其不愿意不去实行这一行为 (*Ostendorf v. Germany*, §§ 93-94)。

60. 只有当“法律规定的义务”的履行无法以更温和的手段实现时, 拘留才能被《公约》所接受 (*Khodorkovskiy v. Russia*, § 136)。比例性原则进一步要求在保证相关义务的及时履行的重要性的自由权的重要性两者之中作出衡量 (*Saadi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70)。

61. 在衡量过程中法院认为以下几点是相关的: 相关法律规定的义务的性质, 包括其背后的目的; 被拘留的人和导致拘留的原因, 还有拘留的时间长短 (*Vasileva v. Denmark*, § 38; *Epple v. Germany*, § 37)。

62. 第 5 条第 1 款 b 项的适用情形包括: 进入一个国家时进行安全检查的义务 (*McVeigh and Others v. United Kingdom*, (Commission report)), 公开个人详细身份的义务 (*Vasileva v. Denmark*, *Novotka v. Slovakia* (裁定); *Sarigiannis v. Italy*), 进行精神检查的义务 (*Nowicka v. Poland*), 离开特定区域的义务 (*Epple v. Germany*), 到警察局接受盘

问的义务 (*Iliya Stefanov v. Bulgaria*; *Osypenko v. Ukraine*; and *Khodorkovskiy v. Russia*)以及坚守和平, 不进行刑事犯罪行为 (*Ostendorf v. Germany*)。

C. 还押候审

第 5 条 § 1(c)

“1. 任何人都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权。除了在下述情况下并遵循法律所规定的程序, 任何人的自由不被剥夺:...

(c) 如果有理由足以怀疑某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或者如果合理地认为有必要防止某人犯罪或者是在某人犯罪后防止其逃脱, 为了将其送交有关的法律当局而对其实施的合法的拘留或者拘留;

1) 逮捕或拘留的目的

63. 在第 5 条第 1 款第 c 项中, “为了将其送交有关的法律当局” 目的条件是三种拘留的法律基础中必不可少的条件 (*Lawless v. Ireland (no. 3)*, §§ 13 and 14; *Ireland v. the United Kingdom*, § 196)。

64. 适用第 5 条第 1 款第 c 项, 个人只能在刑事审判过程中被拘留, 并以将其送交相关的法律当局为目的, 如果有理由怀疑其实施了犯罪行为 (*Ječius v. Lithuania*, § 50; *Schwabe and M.G. v. Germany*, § 72)。

65. 该条款的第二个可能性, 即: 如果合理地认为有必要防止某人犯罪也适用于审前拘留, 并不适用于相关个人未被怀疑已经进行了刑事犯罪的以预防为目的的拘留。

66. 将嫌疑犯送交法院的目的和达成此目的之间是相对独立的。第 5 条第 1 款第 c 项所规定的标准并不意味着在拘留或者拘留期间, 警察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进行起诉 (*Erdagöz v. Turkey*, § 51)。根据第 5 条第 1 款第 c 项, 在拘留期间进行盘问是为了通过确认或消除嫌疑而进行刑事侦查 (*Brogan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 52-54; *Labita v. Italy* [GC], § 155; *O'Hara v. the United Kingdom*, § 36)。

67. 根据第 5 条第 1 款第 c 项采取的拘留必须要与目的之间要符合比例原则。根据第 5 条第 1 款 c 项进行拘留必须通过符合比例的措施达成所述目的 (*Ladent v. Poland*, §§ 55-56)。

68. “有管辖权的法律当局” 与第 5 条第 3 款中的“法官或其他由法律授权执行司法权威的官员” 有相同的意思 (*Schiesser v. Switzerland*, § 29)。

2) “合理怀疑” 的含义

69. 关于实施了犯罪行为的“合理怀疑” 意味着存在一定的客观事实或信息, 会让一个客观公正的观察者认为某人实施了犯罪行为 (*Ilgar Mammadov v. Azerbaijan*, § 88; *Erdagöz v. Turkey*, § 51; *Fox, Campbell and Hartley v. the United Kingdom*, § 32)。因此, 有关当局没有对案件的基本情况与实际调查从而判断相关控诉是否有根据的, 违反了第 5 条第 1 款第 c 项 (*Stepuleac v. Moldova*, § 73; *Elci and Others v. Turkey*, § 674)。

70. “合理” 的标准取决于相关案件的事实 (*Fox, Campbell and Hartley v. the United Kingdom*, § 32)。

71. 在恐怖主义的背景下, 虽然无法要求缔约方公开机密信息, 建立嫌疑犯是恐怖分子的合理怀疑, 法院认为打击恐怖犯罪的急迫并不能成为扩大解释“合理性” 使其损害第 5 条第 1 款第 c 项的借口 (*O'Hara v. the United Kingdom*, § 35)。

72. 匿名的线人提供的未经证实的证据不能建立对申请人涉及黑手党活动的“合理怀疑” (*Labita v. Italy* [GC], §§ 156 *et seq*)。相反被嫌疑人推翻的数年前的认罪陈述并不能移除对申请人和合理怀疑。另外，它并不影响拘留令的合法性(*Talat Tepe v. Turkey*, § 61)。

3) “违法行为”

73. “违法犯罪行为”一词与《公约》第 6 条中的“犯罪”有相同的意思。国内法中违法犯罪的分类是应该考虑的一个因素。但是，诉讼的性质和相关刑罚的严重性也是相关的 (*Benham v. the United Kingdom*, § 56)。

74. “违法犯罪行为”必须是特定的和具体的：依据国家的意志，由于某人的习性而认定其具有危险性并采取避免性拘留，这是不被允许的 (*Guzzardi v. Italy*, § 102; *Ciulla v. Italy*, § 40; *M. v. Germany*, § 89; *Shimovolos v. Russia*, § 54)。

D. 对未成年人的拘留

第5条 § 1(d)

“1. 任何人都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权。除了在下述情况下并遵循法律所规定的程序，任何人的自由不被剥夺：...

(d)“基于实行教育性监督的目的而根据合法命令拘留一个未成年人或者为了将其送交有关的法律当局而对其予以合法的拘留”

1) 一般规定

75. 未成年人的概念包括年龄低于 18 岁的人， (*Koniarska v. United Kingdom* (裁定)), 基于欧洲标准和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通过的 CM (72) 号决议(*X v. Switzerland*,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4 December 1979)。

76. d 项不仅是有关允许拘留未成年人的条款。它包括一个具体的，但不穷尽的，未成年人可以被拘留的情况，那就是 a) 实行教育性监督的目的，b) 为了将其送交有关的法律当局 (*Mubilanzila Mayeka and Kaniki Mitunga v. Belgium*, § 100)。

2) 教育性监督

77. 第 5 条第 1 款 d 项授权根据法院或行政命令，以确保未成年人在教育机构的出勤率为目的所实施的拘留。

78. 在拘留未成年人的情况下，“教育监督”一词不应该僵硬地等同于课堂教学。这种监督包括很多方面，由有关当局实施的，以保证该未成年人的权益和保护 (*P. and S. v. Poland*, § 147; *Ichin and Others v. Ukraine*, § 39; *D.G. v. Ireland*, § 80)。

79. d 项并没有排除监督教育机构采取初步的临时拘留措施，即使该措施本身没有涉及教育性监督。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拘留措施采取之后尽快实施相关教育并提供足够的教育资源 (*Bouamar v. Belgium*, § 50)。

80. 如果一国选择了一种包括剥夺自由的教育监督系统，那么它应该投入适当的机构设施来满足教育和安全的目的从而达到第 5 条第 1 款 d 项的要求 (*A. and Others v. Bulgaria*, § 69; *D.G. v. Ireland*, § 79)。

81. 法院认为如果一个未成年人拘留机构中没有提供教育活动，那么该机构不能被认实施“教育监督” (*Ichin and Others v. Ukraine*, § 39)。

3) 有关法律当局

82. 第 5 条第 1 款 d 项的第二个组成部分规定了以将相关未成年人送交法律当局为目的的实施的合法拘留。根据条约缔结时的相关准备资料，该条文是为了涵盖在民事或行政诉讼之前拘留未成年人的情况，而第 5 条第 1 款第 c 项则涵盖与刑事诉讼相关的拘留。

83. 但是，在准备对该未成年人精神状况出具专家报告时对其进行拘留符合 d 项的规定，即为了将其送交有关法律当局的目的(*X. v. Switzerland*, 委员会 1979 年 12 月 14 日裁定)。

E. 基于社会和医疗原因的拘留

第 5 条 § 1(e)

“1. 任何人都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权。除了在下述情况下并遵循法律所规定的程序，任何人的自由不被剥夺:...

(e)“基于防止传染病蔓延的目的而对某人予以合法的拘留以及对精神失常者，酗酒者，吸毒者或者流氓予以合法的拘留;”

1) 一般规定

84. 《公约》第 5 条第 1 款 e 项规定了多种不同类型的人，包括扩散传染病的人，精神失常者，酗酒者，吸毒者和流氓。在这些中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即他们被剥夺自由是为了接受治疗或者为了社会公共政策的考量，又或者是二者兼有(*Enhorn v. Sweden*, § 43)。

85. 《公约》允许剥夺这些不适应社会的人的自由，不仅仅因为他们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他们自身的利益也使得拘留对他们来时是有必要的(同上; *Guzzardi v. Italy*, § 98)。

2) 预防传染病蔓延

86. 分析为了预防传染病蔓延而拘留某人的合法性时，一些重要的衡量因素包括:

- a) 该传染病蔓延是否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 及
- b) 拘留受感染的人是否是为了防止传染病蔓延的最后方法，即考虑过其他较不严厉的方法而且这些方法不足以保障公共利益。

当不满足以上条件时，剥夺人身自由的法律基础停止存在 (*Enhorn v. Sweden*, § 44)。

3) 拘留精神失常者

87. “精神失常者”这一词语并没有精确的定义因为精神病学一直在发展中，无论是在医学界还是在社会态度上。但是，这不意味着允许仅因为他或她的行为偏离既定的社会规范而将其拘留 (*Rakevich v. Russia*, § 26)。

88. 除非满足下列三个基本条件，否则不允许以“精神失常者”为理由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 (*Stanev v. Bulgaria* [GC], § 145; *D.D. v. Lithuania*, § 156; *Kallweit v. Germany*, § 45; *Shtukurov v. Russia*, § 114; and *Varbanov v. Bulgaria*, § 45; *Winterwerp v. the Netherlands*, § 39).

- a) 可靠且客观的医学专家证明某人精神失常，除非有紧急拘留的需要;
- b) 这个人的精神障碍必须是需要强制拘留的。剥夺其自由必须是在特定情况上有必要的;
- c) 在整个拘留期间，被客观医学证据证实的精神障碍必须持续存在。

89. 在未向医学专家寻求意见的情况下，剥夺被认为精神失常的人的人身自由不符合《公约》第 5 条第 1 款 e 项的规定 (*Ruiz Rivera v. Switzerland*, § 59; *S.R. v. the Netherlands* (dec.), § 31)。

90. 关于以上第二个标准，需要拘留一个精神失常者不仅因为其需要治疗，药物或其他临床治疗来治愈或减轻病情，而且还因为其需要控制和监督，以防止其伤害自己或他人 (*Hutchison Reid v. the United Kingdom*, § 52)。

91. 在决定是否该将某人以“精神失常者”的理由拘留时，国家有关当局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因为在特定的案子中是相关当局首先分析所提出的证据 (*H.L. v. the United Kingdom*, § 98)。

精神状态必须达到特定的严重性才能被认为“真正的”精神失常 (*Glien v. Germany*, § 85)。

92. 在第 5 条第 1 款 e 项的要求下，必须可靠地确定某人为精神失常者的时间应该是采取强制剥夺其人身自由权的措施的时间 (*O.H. v. Germany*, § 78)。

93. 当医学证据表明被拘留的精神失常者正在康复，有关当局需要一些时间来决定是否终止对其的强制措施 (*Luberti v. Italy*, § 28) 但是，单纯的行政理由不足以使继续拘留合法化 (*R.L. and M.-J.D. v. France*, § 129)。

94. 拘留精神失常者的机构必须是医院，诊所，或其经授权且合适拘留这些人的机构 (*Ashingdane v. the United Kingdom*, § 44; *O.H. v. Germany*, § 79)。

95. 对比而言，在转移至合适的机构之前，某人可以被暂时置于不是专门拘留精神失常者的机构，但是等待转移的时间必须不能过长 (参见 *Pankiewicz v. Poland*, §§ 44-45; *Morsink v. the Netherlands*, §§ 67-69; *Brand v. the Netherlands*, §§ 64-66)。

4) 拘留酗酒者和吸毒者

96. 《公约》第 5 条第 1 款 e 项不应被解释为只允许拘留医学上定义的较有限的“酗酒者”，因为该条文的规定并没有阻止国家为了限制酗酒的个人伤害自身或公众，或防止酒后危险行为，而针对酗酒的人采取措施 (*Kharin v. Russia*, § 34)。

97. 因此，一个在医学上并未被鉴定为“酗酒者”的人，其在酒精的影响下所作出的行动会对公共安全或其自身造成威胁的，基于公众或其自身的利益如个人健康或安全的目的，可以将其拘留。 (*Hilda Hafsteinsdóttir v. Iceland*, § 42) 这并不意味着第 5 条第 1 款 e 项允许仅仅因为其摄入酒精便拘留某人 (*Witold Litwa v. Poland*, §§ 61-62)。

5) 流氓

98. 关于拘留“流氓”的案例非常少。该条文涉及范围包括居无定所，无法独立维持生计，没有正当职业的人。这三个条件，受比利时刑法的启发，应该是累积的：他们应该在同一个人身上同时满足 (*De Wilde, Ooms and Versyp v. Belgium*, § 68)。

F. 拘留外国人

第 5 条第 1 款(f)项

“1. 任何人都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权。除了在下列情况下并遵循法律所规定的程序，任何人的自由不被剥夺:...

(f)“为防止某人未经许可进入国境或者为驱逐出境或者是引渡而对某人采取行动并予以合法的逮捕或者拘留”

1) 为防止某人未经许可进入国境实施的拘留

99. 第 5 条第 1 款 f 项允许国家在移民管制的背景下限制外国人的自由。虽然该条款的第一部分允许在国家许可入境前暂时拘留寻求庇护者和其他移民，但这种拘留必须符合第 5 条的目的，即保障自由并保证任何人都不会被任意剥夺人身自由(*Saadi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64-66)。

100. 关于第 5 条第 1 款 f 项的第一部分何时停止适用的问题，主要取决于国内法的规定，因为个人已被官方许可进入国境并居留 (*Suso Musa v. Malta*, § 97)。

101. 禁止任意拘留他人的原则适用于第 5 条第 1 款 f 项的第一部分，也同样适用于其第二部分(*Saadi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73)。

102. 第 5 条第 1 款 f 项第一部分所规定的“禁止任意拘留”f 项意味着必须善意执行拘留，必须与防止未经许可进入国境的目的紧密相关，并谨记这种措施并非针对罪犯，而是针对那些担心自己有生命危险而逃离自己国家的外国人，因此拘留的场所和条件应当适宜；拘留的时长不应超过条款目的合理要求的期间 (*Saadi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74)。

103. 在审查拘留命令执行的方式时，本法院应该考虑那些可能成为移民的人的具体情况 (*Kanagaratnam v. Belgium*, § 80, 申诉人和她的三个孩子被拘留在用于拘留成年人的密闭设施中; *Rahimi v. Greece*, § 108, 对没有他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自动适用拘留)。

2) 为驱逐出境或引渡实施的拘留

104. 第 5 条第 1 款 f 项并不要求拘留必须被合理地认为有必要进行，例如，防止其犯罪或逃跑。从这一点来说，第 5 条第 1 款 f 项提供了不同于第 5 条第 1 款第 c 项的保护：f 项要求的是“所采取的行为是为了驱逐出境或引渡”。因此，在适用该条款时，相关的驱逐出境的决定是否符合国内法或《公约》，是无关紧要的(*Chahal v. the United Kingdom*, § 112; *Čonka v. Belgium*, § 38; *Nasrullojev v. Russia*, § 69; *Soldatenko v. Ukraine*, § 109)。

105. 根据第 5 条第 1 款 f 项的第二部分，拘留可因相关有权机关的询问而得以正当化——即使没有下发正式要求或引渡命令，因为“询问”可以被视为该条款规定中的“行动”(*X v. Switzerland*, Commission decision of 9 December 1980)。

106. 任何基于第 5 条第 1 款 f 项的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只有在驱逐出境或引渡程序正在进行的前提下才能得以正当化。如果上述程序没有得到尽职谨慎执行，那么第 5 条第 1 款 f 项规定的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也将不被允许 (*A.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164; *Amie and Others v. Bulgaria*, § 72)。

107. 要想避免被认为是任意拘留，根据第 5 条第 1 款 f 项实施的拘留必须是善意执行的，必须与政府提出的理由紧密相关，拘留的场所和条件应该适宜，拘留的时长不应该超过该条款合理要求的期间(*Amie and Others v. Bulgaria*, § 72; 同时参见 *Yoh-Ekale Mwanje v. Belgium*, §§ 117-119)。

108. 出于驱逐目的而实施的拘留不应具有惩罚性质，而且应当采取恰当的保障措施 (*Azimov v. Russia*, § 172)。

109. 第 5 条第 1 款 f 项或其他项并不允许在个人自由权利和国家保护其人民免受恐怖袭击的利益两者之间进行权衡(*A.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 171)。

110. 《公约》并未规定在什么情况下许可引渡，也没有规定许可引渡前的程序，而且对逃犯进行逮捕的法律基础是逃犯所属国的国家当局发出的逮捕令，因此有关国家要进行合作，即使是非典型的引渡也不能认为是与《公约》相违背的 (*Öcalan v. Turkey* [GC], § 86; *Adamov v. Switzerland*, § 57)。

111. 当涉及国家间的引渡约定时，如果其中一国是《公约》成员国而另一国不是，引渡条约所制定的规则，以及——在没有引渡条约时——国家间的合作，都是本法院在确定引起申诉的逮捕行为是否合法时需要考虑的有关因素。国家间合作引渡逃犯的行为本身并不会使得逮捕不合法，因此也不会引起有关《公约》第 5 条的问题 (*Öcalan v. Turkey* [GC], § 87)。

112. 成员国根据本法院的指示执行临时措施，即不将某人送回某一特定国家，这一临时措施本身与判断剥夺该个人的人身自由是否符合第 5 条第 1 款的问题并不相关 (*Gebremedhin [Gaberamadhien] v. France*, § 74)。拘留行为仍然应当合法且不任意 (*Azimov v. Russia*, § 169)。

适用该项临时措施阻止某人被驱逐出境，并不使得拘留行为不合法，只要相关的驱逐出境程序仍未完结，且继续拘留的时间合理 (*S.P. v. Belgium* (dec.), and *Yoh-Ekale Mwanje v. Belgium*, § 120)。

IV. 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人应该得到的保障

A. 拘留理由 (第 5 条 § 2)

第5条第2款

“应当以被逮捕的人所能理解的语言立即通知他被逮捕的理由以及被指控的罪名。”

1) 可适用性

113. 第 5 条第 2 款中所有的词语都应该灵活解释，特别是要与第 5 条保护所有人的“人身自由不受任意剥夺的目的相一致”。“逮捕”一词超出了刑事法律措施的范围，而

“任何指控”也并非指适用条件，而是指一种可以考虑的可能性。第 5 条第 4 款并没有区分被逮捕者和被拘留者被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况，因此也不应该将后者排除在第 5 条第 2 款的适用范围之外 (*Van der Leer v. the Netherlands*, §§ 27 and 28)。因此第 5 条第 2 款可以适用于以引渡为目的的拘留 (*Shamayev and Others v. Georgia and Russia*, §§ 414 and 415) 和医学治疗的情况 (*Van der Leer v. the Netherlands*, §§ 27 and 28; *X. v. the United Kingdom*, § 66)，也适用于在假释后重新拘留某人的情况 (*X v. Belgium*, Commission decision)。

2) 目的

114. 第 5 条第 2 款包含了最基本的保障，即被逮捕的人必须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剥夺人身自由，这是第 5 条所提供的保护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当一个人已得知被逮捕的原因，他就能——如果可行——根据第 5 条第 4 款的规定向法院申请质疑拘留的合法性 (*Fox, Campbell and Hartley v. the United Kingdom*, § 40; *Čonka v. Belgium*, § 50)。

115. 任何有权提起诉讼、要求尽快确定拘留合法性的人，只有当他被及时恰当地告知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原因时，才能有效利用这项权利 (*Van der Leer v. the Netherlands* § 28; *Shamayev and Others v. Georgia and Russia*, § 413)。

3) 应该向谁提供理由

116. 从第 5 条第 2 款的措辞可以看出，国家有义务向个人或其代理人提供具体信息 (*Saadi v. the United Kingdom*, § 53, 由大审判庭于 2008 年确认)。如果申诉人无法理解这些信息，应该将相关细节提供给代表其利益的律师或监护人 (*X v. the United Kingdom*, Commission Report, § 106; *Z.H. v. Hungary*, §§ 42-43)。

4) 应该“及时”提供理由

117. 关于当局是否有及时提供相关信息，应该根据不同案件的特殊情况来分析。但并不是必须由实施逮捕的官员在逮捕的那一刻提供 (*Fox, Campbell and Hartley v. the United Kingdom*, § 40; *Murray v. the United Kingdom*, § 72)。

118. 只要被逮捕人在几个小时内被告知逮捕原因，那么就满足了及时性的要求 (*Kerr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 *Fox, Campbell and Hartley v. the United Kingdom*, § 42)。

5) 提供理由的方式

119. 无需在许可逮捕的文件中写明理由，也不需要以书面方式或其他特殊方式告知 (*X v. Germany*, Commission decision, 1978 年 12 月 13 日; *Kane v. Cyprus* (dec.))。

然而，如果在逮捕过程中没有对智力障碍人士的条件予以恰当的考虑——除非其律师或者其他被授权人已被告知该信息，就不能说已经向其提供了应有的信息，使其能够有效利用第 5 条第 4 款所保障的权利以质疑拘留的合法性 (*Z.H. v. Hungary*, § 41)。

120. 可以在逮捕后的讯问或询问阶段告知逮捕理由 (*Fox, Campbell and Hartley v. the United Kingdom*, § 41; *Murray v. the United Kingdom*, § 77; *Kerr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121. 如果被逮捕的人是在其实施故意犯罪行为后立即被逮捕的(*Dikme v. Turkey*, § 54), 或者是他们从之前的逮捕令或引渡请求中就有了解到所指控违法行为的细节(*Öcalan v. Turkey* (dec.)), 就不能宣称不明白逮捕理由。

6) 需要提供的理由的范围

122. 关于当局所提供的信息内容是否充分, 需要根据不同案件的特殊情况来审查(*Fox, Campbell and Hartley v. the United Kingdom*, § 40)。但是, 从第 5 条第 2 款的目的来看, 单纯告知逮捕的法律依据, 是不充分的(*Fox, Campbell and Hartley v. the United Kingdom*, § 41; *Murray v. the United Kingdom*, § 76; *Kortesis v. Greece*, §§ 61-62)。

123. 必须以一种简单的、被逮捕人能够理解的术语将逮捕理由告知被逮捕人, 这样他们才能根据《公约》第 5 条第 4 款向法院申请质疑拘留的合法性(*Fox, Campbell and Hartley v. the United Kingdom*, § 40; *Murray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72) 但是, 第 5 条第 2 款并不要求所提供的信息包括被逮捕人被指控的全部罪行(*Bordovskiy v. Russia*, § 56; *Nowak v. Ukraine*, § 63; *Gasiņš v. Latvia*, § 53)。

124. 出于引渡的目的而实施逮捕时, 所提供的信息可以相对不那么完全(*Suso Musa v. Malta*, §§ 113 and 116; *Kaboulov v. Ukraine*, § 144; *Bordovskiy v. Russia*, § 56), 因为基于这种目的进行逮捕不要求对指控罪行进行实质审查(*Bejaoui v. Greece*, Commission decision)。但是, 这种情况下被逮捕的人也必须得知使他们能够根据《公约》第 5 条第 4 款向法院申请审查合法性的充分信息(*Shamayev and Others v. Georgia and Russia*, § 427)。

7) 使用被逮捕人能够理解的语言

125. 如果逮捕令使用的是被逮捕人所不能理解的语言, 就应该依据第 5 条第 2 款的要求, 在之后的讯问阶段, 以被逮捕人能理解的语言告知其逮捕原因(*Delcourt v. Belgium*, 委员会裁定)。

126. 但是, 当出于这个目的而使用翻译人员时, 当局有责任确保使用翻译的要求是谨慎且精确的(*Shamayev and Others v. Georgia and Russia*, § 425)。

B. 被立即送交法官的权利 (第 5 条 § 3)

第 5 条第 3 款

“根据本条第 1 款第 c 项的规定被逮捕或者拘留的任何人, 应当立即送交法官或是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的官员...”

1) 该条款的目的

127. 第 5 条第 3 款保障被怀疑实施犯罪行为而被逮捕或拘留的人免于被任意或不合理剥夺人身自由(*Aquilina v. Malta* [GC], § 47; *Stephens v. Malta* (no. 2), § 52)。

128. 对政府部门干预个人自由的行为加以司法控制是第 5 条第 3 款所提供保障的重要部分(*Brogan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 58; *Pantea v. Romania*, § 236); *Assenov and Others v. Bulgaria*, § 146)。司法控制是法治的应有之义, 而法治是“《公约》前言明确提到的民主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 是“整个《公约》的精神源泉”(*Brogan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 58)。

129. 司法控制是为了提供有效保障以防止虐待（虐待在拘留早期最可能发生），同时也防止执法人员或其他有权机关滥用权力(*Ladent v. Poland*, § 72)。

2) 及时自动进行司法控制

130. 第 5 条第 3 款的前半部分是为了保证对警察或者根据第 1 款第 c 项实施的行政拘留进行司法控制 (*De Jong, Baljet and Van den Brink v. the Netherlands*, § 51; *Aquilina v. Malta* [GC], §§ 48-49)。

131. 在被逮捕人第一次出庭时，司法控制最重要的就是要及时，从而有利于察觉虐待行为，也有利于保证对个人自由的不正当干预被控制在最低限度内。这一严格的时间要求只有很小的解释空间，否则就会减弱对个人的程序保障，同时可能会损害该权利的实质 (*McKay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33)。

132. 第 5 条第 3 款并没有规定应将被逮捕人或被拘留人及时送交法官或其他司法官员这一要求的任何可能的例外，即使有预先的司法参与，也不例外 (*Bergmann v. Estonia*, § 45)。

133. 任何超过四天的期间，从表面上看，都属于过长的期间(*Oral and Atabay v. Turkey*, § 43; *McKay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47; *Nastase-Silivestru v. Romania*, § 32)。较短的时间也可能违反及时性的要求——如果不存在特别的困难或例外的情况阻止当局尽快将被逮捕人送交法官 (*Ipek and Others v. Turkey*, §§ 36-37; and *Kandzhov v. Bulgaria*, § 66)。

如果警方是在实际剥夺某人的自由一段时间之后拘留此人，那么及时性的要求就更为严格 (*Vassis and Others v. France*, § 60, 将船员拘留在公海上)。

134. 将被逮捕人送交司法机关并不足以保证与第 5 条第 3 款相符合 (*De Jong, Baljet and Van den Brink v. the Netherlands*, § 51; *Pantea v. Romania*, § 231)。

135. 司法控制必须是自动适用的，而不能以被拘留人的先前申请为条件 (*McKay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34; *Varga v. Romania*, § 52; *Viorel Burzo v. Romania*, § 107)。这种要求并不会改变第 5 条第 3 款所提供的保障的性质，这种保障不同于第 5 条第 4 款，后者所保障的是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审查拘留合法性的权利。通过保证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受独立的司法监督，能有助于保证第 5 条第 3 款下保护个人免受任意拘留的目的(*Aquilina v. Malta*, § 49; *Niedbala v. Poland*, § 50)。

136. 要想实现该条款的目的，司法审查的自动适用性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一个受虐待的被拘留人可能无法提起要求法院审查其拘留合法性的申请；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其他弱势的被拘留人，例如精神虚弱者或者那些不能理解司法人员所用语言的人 (*McKay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34; *Ladent v. Poland*, § 74)。

3) 恰当的司法人员的性质

137. 第 5 条第 1 款第 c 项中的“法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的官员”与第 5 条第 1 款第 c 项中的“有关法律当局”有相同的意思(*Schiesser v. Switzerland*, § 29)。

138. 行使“司法权力”并不局限于裁判法律纠纷。第 5 条第 3 款既包括检察院的官员，也包括法庭中的法官 (*Schiesser v. Switzerland*, § 28)。

139. 第三段中所指的“官员”必须能享有法律授予的恰当的“司法”权力(*Schiesser v. Switzerland*, § 30)。

140. 就有权决定人身自由权事项的司法机关的身份认定而言，“法律”中规定的正式、明确的要求比实践标准更为重要(*Hood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60; *De Jong, Baljet and Van den Brink v. the Netherlands*, § 48)。

141. “官员”与“法官”并不一样，但是应该具有后者的一些特性，那就是必须具备某些能对被捕人提供保障的条件(*Schiesser v. Switzerland*, § 31)。

4) 独立性

142. 上述条件中独立性居首位，意指独立于执行机关和涉案当事人。这并不意味着该“官员”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从属于其他法官或者其他官员，只要他们自身享有相似的独立性便可(*Schiesser v. Switzerland*, § 31)。

143. 一位有权决定拘留事项的司法官员有可能同时会有其他的职责，如果该官员有权作为控方代表参与接下来的程序，那么就对其实独立性产生合理怀疑 (*Huber v. Switzerland*, § 43; *Brincat v. Italy*, § 20)。

144. 就这一点而言，在对拘留问题做出决定的时候，公正十分重要：如果“由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在之后代表控方参与刑事审判，其独立性和公正性将会受到质疑(*Brincat v. Italy*, § 21; *Hood v. the United Kingdom*, § 57; *Nikolova v. Bulgaria* [GC], § 49; *Pantea v. Romania*, § 236)。

5) 程序要求

145. 程序上要求“官员”在做出任何恰当的决定前，有义务亲自听取个人证词 (*Schiesser v. Switzerland*, § 31; *De Jong, Baljet and Van den Brink v. the Netherlands*, § 51; *Nikolova v. Bulgaria* [GC], § 49; *Aquilina v. Malta*[GC], § 50)。

146. 在审讯时，律师并不是必须在场(*Schiesser v. Switzerland*, § 36)。但是，将律师排除在审讯程序之外有可能对申诉人陈述案件的能力造成负面影响(*Lebedev v. Russia*, §§ 83-91)。

6) 实质要求

(a) 审查拘留的实质内容

147. 实质上要求“官员”有义务审查各种支持或反对拘留的情况，并根据相关的法律标准，决定拘留是否有正当理由(*Schiesser v. Switzerland*, § 31; *Pantea v. Romania*, § 231)。换言之，第 5 条第 3 款要求司法官员审查有关拘留的实质内容(*Aquilina v. Malta* [GC], § 47; *Krejčíř v. the Czech Republic*, § 89)。

148. 对逮捕和拘留的最初自动审查必须审查合法性问题，并且审查是否能够合理怀疑被捕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换言之，就是拘留符合第 5 条第 1 款第 c 项规定的例外 (*McKay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40; *Oral and Atabay v. Turkey*, § 41)。

149. 司法官员必须审查的问题不仅仅是合法性问题。第 5 条第 3 款所要求的审查是为了确定剥夺个人人身自由的行为是否正当，需要考虑各种支持或反对拘留的情况 (*Aquilina v. Malta* [GC], § 52)。

150. 在具体案件的情况中，合法性审查的适用范围可能比第 5 条第 4 款更窄 (*Stephens v. Malta (no. 2)*, § 58)。

(b) 释放权

151. 如果不存在正当的拘留理由，“官员”应当有权力做出一项释放被拘留人的有效命令(*Assenov and Others v. Bulgaria*, § 146; *Nikolova v. Bulgaria* [GC], § 49; *Niedbala v. Poland*, § 49; *McKay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40)。

152. 为了将延迟降到最低程度，强烈建议首次自动审查拘留合法性和拘留理由的司法官员同样有权决定保释问题。但这并非《公约》的要求，原则上来说，只要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些问题也不是不能由两名不同的司法官员处理。因此，从解释的角度来看，不能要求对保释的审查在比首次自动审查更短的时间内完成，而法院已确定自动审查的最长时间为四天 (*ibidem*, § 47)。

C. 在合理的时间内得到审判或者在审判期间获得释放的权利 (第 5 条第 3 款)

第 5 条第 3 款

“依照本条第 1 款第 c 项被逮捕或者拘留的任何人，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得到审判或者在审判期间得到释放。释放可以担保出庭为条件。”

1) 需要考虑的期限

153. 在确定《公约》第 5 条第 3 项所规定的审判期间的拘留期限时，需要考虑的期限从被告被拘留之日开始直到指控确定之日为止——即使只是由一审法院判决(*Solmaz v. Turkey*, §§ 23-24; *Kalashnikov v. Russia*, § 110; *Wemhoff v. Germany*, § 9)。

154. 鉴于《公约》第 5 条第 3 款与该条第 1 款第 c 项的紧密联系，一审被定罪的人不能被认为是后一项规定的出于“因对其实施犯罪的合理怀疑而将其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的目的”而被拘留的人，而是根据第 5 条第 1 款规定而被拘留的人，该条款授权“在某人被有管辖权的法院定罪后”剥夺其人身自由(*Belevitskiy v. Russia*, § 99; *Piotr Baranowski v. Poland*, § 45; *Górski v. Poland*, § 41)。

2) 一般原则

155. 第 5 条第 3 款的第二部分并非给予司法机关两个选择，即要么在合理的时间内审判被告的案件；要么在审判期间将被告临时释放。在被定罪之前，他必须被假定为无罪，该条款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证，当对他的继续拘留失去合理性时，就应该将其临时释放。

156. 只有当存在比《公约》第 5 条保护的个人人身自由更为重要的真正的公共利益需要时——**虽然需要进行无罪推定**，但继续拘留特定的案件中能够被证明是正当的。

157. 国内的司法机关负有首要责任，保证在具体案件中审前拘留的时间不超过合理时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考虑无罪假定这个原则，同时根据所有事实审查是否存在上述所说的公共利益可以使对第 5 条规定的违背得以正当化，并且将其记录于有关申请释放的决定中。本法院主要根据上述决定中给出的理由，以及申诉人出庭时陈述的已被确定的事实，来决定是否构成对《公约》第 5 条第 3 款的违反。

158. 能够持续合理怀疑被逮捕人实施了犯罪是继续拘留符合合法性的必要条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条件也不足以证明继续拘留的合法性，此时本法院就需要考虑司法机关给出的其他理由是否足以使剥夺个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得以正当化。当存在

“相关”且“充分”的理由时，国内当局还必须在审判过程中尽到“特殊注意”才能得到本法院的认可。

159. 总而言之，国内法院有义务审查审判期间的继续拘留行为，当情况不再足以使继续拘留得以正当化时，法院应该保证被告获得释放。在刚开始的阶段，合理怀疑可以使拘留得以正当化，但到某个阶段时，这个理由已经不够充分。至于拘留的期间是否合理，不能抽象审查，而是必须根据每个案件不同的情况来考虑，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标准 (*McKay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41-45; *Bykov v. Russia* [GC], §§ 61-64; *Idalov v. Russia* [GC], §§ 139-141; *Labita v. Italy* [GC], §§ 152-153; and *Kudla v. Poland* [GC], §§ 110-111)。

160. 支持或反对拘留的论据不能是“一般且抽象的” (*Boicenco v. Moldova*, § 142; *Khudoyorov v. Russia*, § 173), 而必须根据具体的事实，以及能使拘留得以正当化的申诉人具体情况 (*Aleksanyan v. Russia*, § 179)。

161. 准自动化地延长拘留时间违反了第 5 条第 3 款的规定 (*Tase v. Romania*, § 40)。

162. 在上述事项中，举证责任不能倒置，不能要求被拘留者证明存在释放自己的理由 (*Bykov v. Russia* [GC], § 64)。

163. 当可能存在相关事实可以使拘留得以正当化，但国内法院并未在决定中提及，本法院没有义务确定这些事实，不需要代行国内法院的功能 (*Bykov v. Russia* [GC], § 66; *Giorgi Nikolaishvili v. Georgia*, § 77)。只有通过给予一个合理的判决或决定，才有可能实现对司法机关运行的公众监督 (*Tase v. Romania*, § 41)。

3) 继续拘留的理由

164. 《公约》的案例法已经确定了四项拒绝保释的基本理由：1) 被告将会在应当出庭时缺席；2) 一旦释放，被告会采取妨碍司法机关运行的行为，或 3) 继续犯罪，或 4) 扰乱公共秩序 (*Tiron v. Romania*, § 37; *Smirnova v. Russia*, § 59; *Piruzyan v. Armenia*, § 94)。

① 潜逃的危险

165. 潜逃的危险并不应该仅仅从被告罪行的严重程度来考虑，还应该考虑其他的一些要么能够确定存在潜逃危险、要么使得审前拘留没有必要的因素 (*Panchenko v. Russia*, § 106)。

166. 审查潜逃危险大小时还应该考虑被告的性格、道德水平、住宅、职业、财产、家庭关系，还有与被控告所在国的各种联系 (*Becciev v. Moldova*, § 58)。

167. 只是缺乏固定居住地并不一定引起潜逃的危险 (*Sulaoja v. Estonia*, § 64)。

168. 随着拘留时间的延长，潜逃危险必然会减小 (*Neumeister v. Austria*, § 10)。

169. 可能被判的刑罚严重程度是审查潜逃可能性大小的因素之一，但是指控的严重程度本身并不能使长期的审前拘留得以正当化 (*Idalov v. Russia* [GC], § 145; *Garycki v. Poland*, § 47; *Chraidi v. Germany*, § 40; *Ilijkov v. Bulgaria*, §§ 80-81)。

170. 虽然一般而言，“共犯”的供词可能是存在犯罪的主要表现，但是单凭该供词不足以使长时间的拘留得以正当化 (*Dereci v. Turkey*, § 38)。

② 阻碍诉讼程序

171. 在判断被告是否有可能阻碍诉讼程序正常进行时，不应该只抽象地考虑，而需要用事实证据来证明 (*Becciev v. Moldova*, § 59)。

172. 在审判初期可以接受有可能对证人带来压力这个理由 (*Jarzynski v. Poland*, § 43)。

173. 但是长远而言，保证调查这个要求并不足以使拘留嫌疑人得以正当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询问已经完成，陈述已经记录完毕，调查也已完成，上述风险会慢慢降低 (*Clooth v. Belgium*, § 44)。

③再次犯罪

174. 指控的严重性可能会使司法机关决定对嫌疑人还押拘留，以防止其再次犯罪。但是根据相关案件的情况，特别是以往的事实和被告的品格，这个风险必须是合理的，采取的措施也必须恰当 (*Clooth v. Belgium*, § 40)。

175. 以往的犯罪可以作为担心被告会再次犯罪的合理理由 (*Selçuk v. Turkey*, § 34; *Matznetter v. Austria*, § 9)。

176. 不能从被告没有工作或家人这一事实推断出被告会再次犯罪 (*Sulaoja v. Estonia*, § 64)。

④保障公共秩序

177. 由于案件的严重性和公众的反应，某些犯罪有可能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从而使审前拘留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得以正当化。在例外的情况下，本法院会根据《公约》的目的将这一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只要国内法律确认某一具体犯罪会导致公众秩序混乱。

178. 但是，只有当事实能够表明释放被告有可能会引起公共秩序混乱时，这一因素才会被认为是相关且充分的。另外，只有在公共秩序持续受到实际威胁时，继续拘留才是合法的，而且继续拘留也不代表被判处刑罚 (*Letellier v. France*, § 51; *I.A. v. France*, § 104; *Prencipe v. Monaco*, § 79; *Tiron v. Romania*, §§ 41-42)。

4) 特殊注意

179. 调查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是在确定当局在诉讼程序中是否尽到了“特殊注意”时应该考虑的因素 (*Scott v. Spain*, § 74)。

180. 被拘留的被告要求其案件得到快速处理的权利不应该阻碍司法机关恰当地行使其职能 (*Shabani v. Switzerland*, § 65; *Sadegül Özdemir v. Turkey*, § 44)。

5) 替代措施

181. 当决定是应该释放还是拘留某人时，当局应该考虑采取替代措施来保障其出庭 (*Idalov v. Russia* [GC], § 140)。该条规定不仅涉及“在合理时间内得到审判或是在审判期间得到释放”的权利，还涉及“如果能够保证被告出庭，就可以将其释放” (*Khudoyorov v. Russia*, § 183; *Lelièvre v. Belgium*, § 97; *Shabani v. Switzerland*, § 62)。

6) 保释

182. 《公约》第 5 条第 3 款提供的保护不仅是为了保证损失得到赔偿，还为了保证被告能出庭。因此应该主要考虑“被告的财产以及担保人与被告的关系，换言之，就是考虑不出庭导致失去保释金或者有损于担保人的后果这一可能性足以使被告打消潜逃想法的程度” (*Mangouras v. Spain* [GC], § 78; *Neumeister v. Austria*, § 14)。

183. 只有当存在正当的拘留理由时，才会要求提供保释金 (*Musuc v. Moldova*, § 42; *Aleksandr Makarov v. Russia*, § 139)。如果保释金或者其他保证能够避免潜逃的危险，那么被告就应该被释放，要注意，当有可能判处较轻刑罚时，被告潜逃的可能性会降低，应该将这一点纳入考虑范围 (*Vrenčev v. Serbia*, § 76)。当局在确定保释时应该考虑

周全，要考虑是否必须继续拘留被告(*Piotr Osuch v. Poland*, § 39; *Bojilov v. Bulgaria*, § 60; *Skrobol v. Poland*, § 57)。

184. 另外，保释金的金额应该在确定保释的决定中解释清楚 (*Georgieva v. Bulgaria*, §§ 15, 30 and 31)，而且必须考虑被告的收入 (*Hristova v. Bulgaria*, § 111) 和他的支付能力 (*Toshev v. Bulgaria*, §§ 69-73)。在某些特定情况中，也可以考虑应归咎于被告的损失(*Mangouras v. Spain* [GC], §§ 81 and 92)。

185. 在没有任何司法控制的情况下根据法律自动拒绝保释，这不符合第 5 条第 3 款的规定 (*Piruzyan v. Armenia*, §105; *S.B.C. v. the United Kingdom*, §§ 23-24)。

7) 拘留期的合理性

186. 《公约》第 5 条第 3 款不能解释为，只要拘留不超过一定的最短时间段，就可以无条件允许审前拘留。任何长度的拘留期，无论多短，当局都应该表明其合法性 (*Idalov v. Russia* [GC], § 140; *Tase v. Romania*, § 40; *Castravet v. Moldova*, § 33; *Belchev v. Bulgaria*, § 82)。

8) 对未成年人的审前拘留

187. 对未成年人进行的审前拘留应该作为最后的不得已措施；拘留期间应该尽可能地短，而且，当拘留是严格需要时，未成年人应该与成年人分开关押(*Nart v. Turkey*, § 31; *Güveç v. Turkey*, § 109)。

D. 要求法庭迅速审查拘留合法性的权利（第 5 条第 4 款）

第 5 条第 4 款

“每个被逮捕或者被拘留而被剥夺自由的人都应该享有通过诉讼迅速确定其拘留的合法性以及当确定其拘留合法时得以释放的权利。”

1) 条款目的

188. 第 5 条第 4 款是《公约》中的人身保护规定，它为被拘留者提供了主动请求司法审查的权利 (*Mooren v. Germany* [GC], § 106; *Rakevich v. Russia*, § 43)。

189. 本法院不认为违反《公约》第 5 条第 1 款，并不意味着可以免于对是否符合第 5 条第 4 款的审查。这两款规定是相互独立的，符合前者的要求并不意味着必然符合后者的要求 (*Douiye v. the Netherlands* [GC], § 57; *Kolompar v. Belgium*, § 45)。

2) 所要求的审查的性质

190. 第 5 条第 4 款保障被逮捕者或被拘留者有权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审查剥夺其自由的程序性和实质性条件（从第 5 条第 1 款的意义上来说）的“合法性” (*Idalov v. Russia* [GC], § 161; *Reinprecht v. Austria*, § 31)。

第 5 条第 4 款中的“合法性”与第 5 条第 1 款中的含义相同，因此，被逮捕者或被拘留者不仅有权根据国内法的要求，还有权根据《公约》要求、《公约》的一般原则

以及第 5 条第 1 款所允许的限制目的来要求审查对其拘留的“合法性”(*Suso Musa v. Malta*, § 50)。

191. 符合第 5 条第 4 款的司法审查的形式在每个领域都可能有所差别，同时也取决于所涉及的剥夺自由的方式(*M.H. v. the United Kingdom*, § 75)。

192. 并不排除法院对拘留合法性的定期自动审查机制可以保证符合第 5 条第 4 款的要求，但是，在建立起自动审查之后，应当在“合理时间间隔”做出关于拘留合法性的决定(*Abdulhanov v. Russia*, §§ 209 and 212-14, 总结概括了与第 5 条第 1 款 a、c、e 和 f 项所规定的拘留情形有关的判例)。

193. 若根据《公约》第 5 条第 1 款第 c 项拘留某人，“法院”必须被授权审查是否有足够证据合理怀疑他/她已犯罪，因为要想使得还押拘留在《公约》的意义上“合法”，证明此种怀疑的存在就十分重要(*Nikolova v. Bulgaria* [GC], § 58)。

194. 当某人被有权法庭定罪并剥夺自由时，第 5 条第 4 款所要求的监督就被包括在裁判程序最终的法庭判决中(*De Wilde, Ooms and Versyp v. Belgium*, § 76)，因此不需要进一步的审查。然而，如果判决并剥夺某人自由的依据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就要求保留对《公约》第 5 条第 4 款所规定的个体提出追索的可能性(*Kafkaris v. Cyprus*(dec.), § 58)。

195. 根据第 5 条第 4 款，被拘留者有权依据在最初决定剥夺其人身自由之后出现的新因素，申请有管辖权的“法院”迅速确定对其自由的剥夺已变得“非法”(*Abdulhanov v. Russia*, § 208; *Azimov v. Russia*, §§ 151-52)。

196. 被长期强制监禁在精神治疗场所的精神不健全的人，有权“在合理的时间间隔内”提起诉讼，质疑其监禁的合法性(*M.H. v. the United Kingdom*, § 77, 对可适用原则的最新总结)。仅当局有权启动的定期审查机制是不够的(*X. v. Finland*, § 170; *Raudevs v. Latvia*, § 82)。

197. 第 5 条第 1 款 e 项意义上的“合法拘留”的标准包括：在涉及精神疾病患者的继续拘留时，第 5 条第 4 款所保障的对合法性的审查应当以最新的医疗评估为证据，参考病人当时的健康状态（包括其危险性），而不是参考在做出最初的拘留决定时的情况(*Juncal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 30; *Ruiz Rivera v. Switzerland*, § 60; *H.W. v. Germany*, § 107)。

198. 被拘留者出于第 5 条第 4 款规定的目的而求助的“法院”，并不必须是处于该国标准司法体系内的传统法院 (*Weeks v. the United Kingdom*, § 61)。但是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提供一定程序保障、具有“裁判特征”的主体。因此该“法院”必须独立于行政机关和案件的双方 (*Stephens v. Malta (no. 1)*, § 95)。

199. 要想满足《公约》的要求，国内法院所进行的审查必须符合国家司法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同时也要符合第 5 条的目的，即保护个人免受任意侵害 (*Koendjibharie v. the Netherlands*, § 27)。

200. 尽管第 5 条第 4 款并不强制缔约国为审查拘留合法性建立第二层次的司法权，原则上来说，建立这种机制的国家必须在上诉程序中给予被拘留者与一审程序中相同的保障 (*Kučera v. Slovakia*, § 107; *Navarra v. France*, § 28; *Toth v. Austria*, § 84)。

201. 第 5 条第 4 款并不强制法院在审查对拘留的上诉时注重上诉人所提交的意见中所包含的每一项论据。然而，法院并不能忽视或忽略被拘留者所提供的、能引起对剥夺其自由行为（在《公约》意义上的）“合法性”的质疑的具体事实 (*Ilijkov v. Bulgaria*, § 94)。

202. “法院”如果发现拘留不合法，必须具有下达释放命令的权利；仅仅拥有建议的权利是不够的 (*Benjamin and Wilson v. the United Kingdom*, §§ 33 and 34)。

3) 程序保障

203. 第 5 条第 4 款中的程序公正要求并不规定适用于无关内容、事实和情形的固定不变的标准。尽管并不总是要求符合第 5 条第 4 款的程序必须具有和第 6 款中对刑事或民事诉讼所要求的相同的保障，但它也必须具有裁判特征，并为所涉及的剥夺自由的类型提供适当的保障（[A.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203; [Idalov v. Russia](#) [GC], § 161）。

204. 当对某人的拘留属于第 5 条第 1 款第 c 项所规定的情形时，必须开庭审理（[Nikolova v. Bulgaria](#) [GC], § 58）。被拘留者本人或者通过其他形式的代理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是与剥夺自由有关的诉讼程序中最基本的保障之一（[Kampanis v. Greece](#), § 47）。

然而，第 5 条第 4 款并不要求每次在被拘留者提起反对延长其拘留的决定的上诉时都开庭审理，但是在合理的情况下，应该允许行使此项权利（[Çatal v. Turkey](#), § 33; [Altınok v. Turkey](#), § 45）。

205. 诉讼程序必须是对抗式的，并且必须允许双方之间的“平等手段原则”（[Reinprecht v. Austria](#), § 31; [A.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204）。在还押候审的情况下，由于对被告实施了犯罪的合理怀疑是继续拘禁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就必须给予被拘留者有效质疑针对其指控的基础的机会。这可能要求法院听取证人与继续拘留的合法性有关的证言（[Turcan v. Moldova](#), §§ 67-70）。

如果申诉人或其律师被拒绝获取调查档案里对于有效质疑拘留合法性来说十分重要的文件，那么平等手段原则就没有得到保障（[Ovsjannikov v. Estonia](#), § 72; [Fodale v. Italy](#), § 41; [Korneykova v. Ukraine](#), § 68）。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所涉及的个人不仅应当有机会被听取个人陈述，还应当有机会获得律师的有效帮助（[Cernák v. Slovakia](#), § 78）。

206. 对抗式程序以及平等手段的原则必须在上诉法庭的审理过程中得到同等的尊重（[Çatal v. Turkey](#), §§ 33-34 以及其中引用的案例）。

4) 要求“迅速”

207. 第 5 条第 4 款不仅保障被拘留者有权提起诉讼质疑拘留的合法性，还保障其有权在提出诉讼之后就拘留的合法性得到迅速审判并在证明非法的情况下得到终止令（[Idalov v. Russia](#) [GC], § 154; [Baranowski v. Poland](#), § 68）。得到迅速审判的权利是否被尊重必须在不同案例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hbock v. Slovenia](#), § 84）。

208. 在某人被拘留之后，如果有必要，必须尽快提供法律审查的机会，并在之后的合理时间间隔内定期审查（[Molotchko v. Ukraine](#), § 148）。

209. 与第 5 条第 3 款的“及时”（马上）相比，“迅速”（在短时间内）的概念表示了比之较小的紧迫性（[E. v. Norway](#), § 64; [Brogan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 59）。

然而，当非司法机关而不是法院决定拘留某人时，第 5 条第 4 款所要求的司法审查的“迅速”标准就接近于第 5 条第 3 款的“及时”标准了（[Shcherbina v. Russia](#), §§ 65-70，对于公诉人向申诉人下达的拘留令的司法审查延迟了 16 天，本法院认为这一期限过长）。

210. 在上诉程序中，“迅速”标准就没有那么严格（[Abdulkhanov v. Russia](#), § 198）。如果最初的拘留令是由法院依据恰当程序作出的，那么本法院就会容忍二审法院在诉讼中较长的审查期限（[Shcherbina v. Russia](#), § 65）。

(a) 需要考虑的期间

211. 本法院将提出释放申请或提起诉讼的时间作为起点。在对申诉人拘留的合法性作出最终决定时（包括任何上诉程序），相关的期间就随之结束（[Sanchez-Reisse v. Switzerland](#), § 54; [E. v. Norway](#), § 64）。

212. 如果在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前必须先穷尽行政救济，那么期间就应该从行政当局着手处理时起算（[Sanchez-Reisse v. Switzerland](#), § 54）。

213. 如果在两个以上的司法层次进行了诉讼，就必须从总体上审查确定是否符合“迅速”这一要求（[Hutchison Reid v. the United Kingdom](#), § 78; [Navarra v. France](#), § 28）。

(b) 评估速度需要考虑的相关因素

214. 不能抽象地定义“迅速”一词。就如同第 5 条第 3 款和第 6 条第 1 款中“合理的时间”一词一样，是否“迅速”也必须在不同的案例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M.D. v. Switzerland](#), § 42）。

215. 在审查第 5 条第 4 款所要求的迅速特征时，可以参照那些在审查《公约》第 5 条第 3 款和第 6 条第 1 款意义上的“合理时间”要求时发挥作用的因素，来考虑可以比较的因素，例如当局表现出的勤勉程度，任何由被拘留人员造成的迟延以及其他不涉及国家责任的造成迟延的因素（[Mooren v. Germany](#) [GC], § 106; [Kolompar v. Belgium](#), § 42）。

216. 在与第 6 条第 1 款有关的案例中，**每一审级程序持续一年的做法**或许可以作为惯例，但是第 5 条第 4 款是关于自由的问题，因此特别要求迅速（[Panchenko v. Russia](#), § 117）。在有关个人自由的问题上，本法院对于国家是否符合迅速审查拘留合法性的要求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Kadem v. Malta](#), §§ 44-45, 本法院认为，用 17 天来决定对申诉人的拘留是否合法，时间过长；[Mamedova v. Russia](#), § 96, 上诉程序持续了 26 天，被认为是违反了“迅速”这一要求）。

217. 如果决定涉及复杂的问题——比如被拘留人员的医疗状况，那么在确定多长时间属于第 5 条第 4 款所要求的“合理”时，应当考虑这些问题的复杂性。然而，即使在复杂情况下，仍然要求当局对某些因素进行极为迅速的审查，包括在审前拘留案件中的无罪推定（[Frasik v. Poland](#), § 63; [Jablonski v. Poland](#), §§ 91-93）。

218. 在刑事案件中，对于还押候审的审查时间间隔应当很短（[Bezicheri v. Italy](#), § 21）。

219. 如果在作出决定前，时间长度初步看来就与迅速的概念不相符，本法院会要求国家解释迟延的原因，或者提出特别的理由来证明时间迟延的正当性（[Musiał v. Poland](#) [GC], § 44; [Koendjibiharie v. the Netherlands](#), § 29）。

220. 无论是过重的工作负荷，还是假期，都不能成为司法当局在一段时间内不作为的正当理由（[E. v. Norway](#), § 66; [Bezicheri v. Italy](#), § 25）。

E. 因非法拘留得到赔偿的权利 (第 5 条第 5 款)

第 5 条第 5 款

“违反本条规定被逮捕或者拘留的任何人都有权得到赔偿。”

1) 适用性

221. 第 5 款中规定的受赔偿权的前提是国内当局或者本法院已经确定拘留行为违反了第 5 条的其他任何一款 (*N.C. v. Italy* [GC], § 49; *Pantea v. Romania*, § 262; *Vachev v. Bulgaria*, § 78)。

222. 如果国内当局并不认为存在直接或实质违反第 5 条其他条款的情况, 本法院必须自己首先确定存在上述的违反情况后, 才能适用第 5 条第 5 款 (*Nechiporuk and Yankalo v. Ukraine*, §§ 227 and 229; *Yankov v. Bulgaria*, §§ 190-193)。

223. 第 5 条第 5 款的适用性并不取决于国内法院认为行为违法的认定或者证明如果不是违反第 5 条的情况涉案人员本应该被释放的证据(*Blackstock v. the United Kingdom*, § 51; *Waite v. the United Kingdom*, § 73)。逮捕或拘留从国内法来看可能是合法的, 但仍然违反了第 5 条, 因此可以适用第 5 条第 5 款(*Harkmann v. Estonia*, § 50)。

2) 司法救济

224. 第 5 条第 5 款规定了一项直接且可执行的在国内法院提起赔偿请求的权利(*A.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229; *Storck v. Germany*, § 122)。

3) 赔偿的可获得性

225. 遵守第 5 条第 5 款需要保证有可能就涉及剥夺人身自由的违反第 5 条第 1、2、3、4 款的行为要求赔偿(参见最近案件, *Michalák v. Slovakia*, § 204; *Lobanov v. Russia*, § 54)。

226. 可执行的受赔偿权必须在本法院判决前或判决后是可获得的(*Stanev v. Bulgaria* [GC], §§ 183-184; *Brogan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 67)。

227. 有效地享有受赔偿权必须由足够的确定性来保证 (*Ciulla v. Italy*, § 44; *Sakik and Others v. Turkey*, § 60)。赔偿必须在理论上(*Dubovik v. Ukraine*, § 74)和实践上都具有可获得性(*Chitayev and Chitayev v. Russia*, § 195)。

228. 在考虑赔偿的要求时, 国内当局必须根据《公约》第 5 条的精神来解释和适用国内法, 而不应过分形式主义 (*Shulgin v. Ukraine*, § 65; *Houtman and Meeus v. Belgium*, § 46)。

4) 赔偿的性质

229. 受赔偿权主要指的是经济赔偿, 它并不包括第 5 条第 4 款规定的保证被拘留人被释放的权利 (*Bozano v. France*, Commission decision)。

230. 将审前拘留的时间计入刑罚时间并不属于第 5 条第 5 款规定的赔偿, 因为它不是经济性的 (*Wloch v. Poland (no. 2)*, § 32)。

5) 损害的存在

231. 第 5 条第 5 款并不禁止缔约国根据涉案当事人因违反《公约》的行为所受损害的程度来进行赔偿。如果不存在金钱上或精神上的损害, 那就不存在“赔偿”的问题 (*Wassink v. the Netherlands*, § 38)。

232. 但是, 过分形式主义地要求精神损害的证据, 不符合受赔偿权的规定 (*Danev v. Bulgaria*, §§ 34-35)。

6) 赔偿的数额

233. 《公约》第 5 条第 5 款并不赋予申诉人拿到特定数额赔偿的权利(*Damian-Burueana and Damian v. Romania*, § 89; *Çağdaş Şahin v. Turkey*, § 34)。

234. 但是，可以忽视的或者与违反行为的严重性不相符的赔偿就不符合第 5 条第 5 款的规定，因为这会使得该条款保障的权利成为理论上的或虚幻的(*Cumber v. the United Kingdom*, Commission decision; *Attard v. Malta* (dec.))。

235. 赔偿数额不能明显低于本法院在类似案件中判决的赔偿数额 (*Ganea v. Moldova*, § 30; *Cristina Boicenco v. Moldova*, § 43)。

援引案例一览

本指南援引的判例法涉及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或裁定以及欧洲人权委员会的决定或报告。

除非另行指明，所有参考皆是本法院审判庭依法作出的判决。缩写“（dec.）”是指该处援引为本法院裁定，“[GC]”是指该案件由大审判庭审判。

本指南电子版中援引案例的超链接直接跳转 HUDOC 数据库（<<http://hudoc.echr.coe.int>>）。该数据库提供本法院（包括大审判庭、审判庭和委员会的判决、裁定和相关案例、咨询意见以及案例法信息注解中的法律总结）、委员会（决定和报告）和部长委员会（决议）的判例法。

本法院以英语和/或法语这两种官方语言发布判决和裁定。HUDOC 也包含许多重要案例的近 30 种非官方言语的翻译，以及由第三方制作的大约 100 个在线案例汇总的链接。

A. and Others v. Bulgaria, no. 51776/08, 29 November 2011
A.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no. 3455/05, ECHR 2009
Adamov v. Switzerland, no. 3052/06, 21 June 2011
Airey v. Ireland, no. 6289/73, Commission decision of 7 July 1977, D.R. 8, p. 42
Aleksandr Makarov v. Russia, no. 15217/07, 12 March 2009
Aleksanyan v. Russia, no. 46468/06, 22 December 2008
Altınok v. Turkey, no. 31610/08, 29 November 2011
Ambruszkiewicz v. Poland, no. 38797/03, 4 May 2006
Amuur v. France, 25 June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III
Angelova v. Bulgaria, no. 38361/97, ECHR 2002-IV
Aquilina v. Malta [GC], no. 25642/94, ECHR 1999-III
Ashingdane v. the United Kingdom, 28 May 1985, Series A no. 93
Assanidze v. Georgia [GC], no. 71503/01, ECHR 2004-II
Assenov and Others v. Bulgaria, 28 October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VIII
Attard v. Malta (裁定), no. 46750/99, 28 September 2000
Austin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nos. 39692/09, 40713/09 and 41008/09, 15 March 2012
B. v. Austria, 28 March 1990, Series A no. 175
Baranowski v. Poland, no. 28358/95, ECHR 2000-III
Becciev v. Moldova, no. 9190/03, 4 October 2005
Beiere v. Latvia, no. 30954/05, 29 November 2011
Bejaoui v. Greece, no. 23916/94, Commission decision of 6 April 1995
Belchev v. Bulgaria, no. 39270/98, 8 April 2004
Belevitskiy v. Russia, no. 72967/01, 1 March 2007
Benham v. the United Kingdom, 10 June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III
Benjamin and Wilson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28212/95, 26 September 2002
Bergmann v. Estonia, no. 38241/04, 29 May 2008
Bezicheri v. Italy, 25 October 1989, Series A no. 164

Blackstock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59512/00, 21 June 2005
Boicenco v. Moldova, no. 41088/05, 11 July 2006
Bojilov v. Bulgaria, no. 45114/98, 22 December 2004
Bollan v. the United Kingdom (裁定), no. 42117/98, ECHR 2000-V
Bordovskiy v. Russia, no. 49491/99, 8 February 2005
Bouamar v. Belgium, 29 February 1988, Series A no. 129
Bozano v. France, no. 9990/82,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5 May 1984, D.R. 39, 119
Bozano v. France, 18 December 1986, Series A no. 111
Brand v. the Netherlands, no. 49902/99, 11 May 2004
Brega and Others v. Moldova, no. 61485/08, 24 January 2012
Brincat v. Italy, 26 November 1992, Series A no. 249-A
Brogan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29 November 1988, Series A no. 145-B
Bykov v. Russia [GC], no. 4378/02, 10 March 2009
Çağdaş Şahin v. Turkey, no. 28137/02, 11 April 2006

Calmanovici v. Romania, no. 42250/02, 1st July 2008
Castravet v. Moldova, no. 23393/05, 13 March 2007
Çatal v. Turkey, no. 26808/08, 17 April 2012
Chahal v. the United Kingdom, 15 November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V
Chitayev and Chitayev v. Russia, no. 59334/00, 18 January 2007
Chraidi v. Germany, no. 65655/01, ECHR 2006-XII
Ciulla v. Italy, 22 February 1989, Series A no. 148
Clooth v. Belgium, 12 December 1991, Series A no. 225
Čonka v. Belgium, no. 51564/99, ECHR 2002-I
Creangă v. Romania [GC], no. 29226/03, 23 February 2012
Cristina Boicenco v. Moldova, no. 25688/09, 27 September 2011
Cumber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28779/95,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7 November 1996
D.D. v. Lithuania, no. 13469/06, 14 February 2012
D.G. v. Ireland, no. 39474/98, ECHR 2002-III
Dacosta Silva v. Spain, no. 69966/01, ECHR 2006-XIII
Damian-Burueana and Damian v. Romania, no. 6773/02, 26 May 2009
Danev v. Bulgaria, no. 9411/05, 2 September 2010
De Jong, Baljet and Van den Brink v. the Netherlands, 22 May 1984, Series A no. 77
Delcourt v. Belgium, no. 2689/65, Commission decision of 7 February 1967
Dereci v. Turkey, no. 77845/01, 24 May 2005
De Wilde, Ooms and Versyp v. Belgium, 18 November 1970, Series A no. 12
Dikme v. Turkey, no. 20869/92, ECHR 2000-VIII
Douiye v. the Netherlands [GC], no. 31464/96, 4 August 1999
Drozd and Janousek v. France and Spain, 26 June 1992, Series A no. 240
Dubovik v. Ukraine, nos. 33210/07 and 41866/08, 15 October 2009
E. v. Norway, 29 August 1990, Series A no. 181-A
Elci and Others v. Turkey, nos. 23145/93 and 25091/94, 13 November 2003
Engel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8 June 1976, Series A no. 22
Enhorn v. Sweden, no. 56529/00, ECHR 2005-I
Epple v. Germany, no. 77909/01, 24 March 2005
Erdagöz v. Turkey, no. 21890/93, 22 October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VI
Erkalo v. the Netherlands, 2 September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VI
Farhad Aliyev v. Azerbaijan, no. 37138/06, 9 November 2010
Fodale v. Italy, no. 70148/01, ECHR 2006-VII
Foka v. Turkey, no. 28940/95, 24 June 2008
Fox, Campbell and Hartley v. the United Kingdom, 30 August 1990, Series A no. 182

Frasik v. Poland, no. 22933/02, ECHR 2010 (extracts)
Freda v Italy, no. 8916/80, Commission decision of 7 October 1980, D.R. 21, p. 254
Ganea v. Moldova, no. 2474/06, 17 May 2011
G.K. v. Poland, no. 38816/97, 20 January 2004
Gaidjurgis v. Lithuania (裁定), no. 49098/99, 16 June 2001
Galstyan v. Armenia, no. 26986/03, 15 November 2007
Garycki v. Poland, no. 14348/02, 6 February 2007
Gasiņš v. Latvia, no. 69458/01, 19 April 2011
Gatt v. Malta, no. 28221/08, ECHR 2010
Gebremedhin [Gaberamadhien] v. France, no. 25389/05, ECHR 2007-II
Georgieva v. Bulgaria, no. 16085/02, 3 July 2008
Gillan and Quinton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4158/05, ECHR 2010-(extracts)
Giorgi Nikolaishvili v. Georgia, no. 37048/04, 13 January 2009
Giulia Manzoni v. Italy, 1st July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IV
Górski v. Poland, no. 28904/02, 4 October 2005
Güveç v. Turkey, no. 70337/01, ECHR 2009 (extracts)
Guzzardi v. Italy, 6 November 1980, Series A no. 39
H.L.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45508/99, ECHR 2004-IX
H.M. v. Switzerland, no. 39187/98, ECHR 2002-II
Harkmann v. Estonia, no. 2192/03, 11 July 2006
Hilda Hafsteinsdóttir v. Iceland, no. 40905/98, 8 June 2004
Hood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no. 27267/95, ECHR 1999-I
Houtman and Meeus v. Belgium, no. 22945/07, 17 March 2009
Hristova v. Bulgaria, no. 60859/00, 7 December 2006
Huber v. Switzerland, 23 October 1990, Series A no. 188
Hutchison Reid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50272/99, ECHR 2003-IV
I.A. v. France, 23 September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VII
I.I. v. Bulgaria, no. 44082/98, 9 June 2005
Ichin and Others v. Ukraine, nos. 28189/04 and 28192/04, 21 December 2010
Idalov v. Russia [GC], no. 5826/03, 22 May 2012
Ilaşcu and Others v. Moldova and Russia [GC], no. 48787/99, ECHR 2004-VII
Ilijkov v. Bulgaria, no. 33977/96, 26 July 2001
Iliya Stefanov v. Bulgaria, no. 65755/01, 22 May 2008
Ipek and Others v. Turkey, nos. 17019/02 and 30070/02, 3 February 2009
Ireland v. the United Kingdom, 18 January 1978, Series A no. 25
Iskandarov v. Russia, no. 17185/05, 23 September 2010
Jablonski v. Poland, no. 33492/96, 21 December 2000
Jarzyński v. Poland, no. 15479/02, 4 October 2005
Ječius v. Lithuania, no. 34578/97, ECHR 2000-IX
Kerr v. the United Kingdom (裁定), no. 40451/98, 7 December 1999
Kaboulov v. Ukraine, no. 41015/04, 19 November 2009
Kadem v. Malta, no. 55263/00, 9 January 2003
Kafkaris v. Cyprus (no. 2) (裁定), no. 9644/09, 21 June 2011
Kalashnikov v. Russia, no. 47095/99, ECHR 2002-VI
Kallweit v. Germany, no. 17792/07, 13 January 2011
Kampanis v. Greece, no. 17977/91, 13 July 1995
Kanagaratnam v. Belgium, no. 15297/09, 13 December 2011
Kandzhov v. Bulgaria, no. 68294/01, 6 November 2008
Kane v. Cyprus (裁定), no. 33655/06, 13 September 2011
Kharin v. Russia, no. 37345/03, 3 February 2011
Khodorkovskiy v. Russia, no. 5829/04, 31 May 2011
Khudoyorov v. Russia, no. 6847/02, ECHR 2005-X (extracts)

Koendjbiharie v. the Netherlands, 25 October 1990, Series A no. 185-B
Kolompar v. Belgium, 24 September 1992, Series A no. 235-C
Koniarska v. United Kingdom, no.33670/96, (裁定) 12 October 2000
Korneykova v. Ukraine, no. 39884/05, 19 January 2012
Kortesis v. Greece, no. 60593/10, 12 June 2012
Krejčíř v. the Czech Republic, nos. 39298/04 and 8723/05, 26 March 2009
Kučera v. Slovakia, no. 48666/99, 17 July 2007
Kudła v. Poland [GC], no. 30210/96, ECHR 2000-XI
Kurt v. Turkey, 25 May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III
Labita v. Italy [GC], no. 26772/95, ECHR 2000-IV
Ladent v. Poland, no. 11036/03, 18 March 2008
Laumont v. France, no. 43626/98, ECHR 2001-XI
Lavents v. Latvia, no. 58442/00, 28 November 2002
Lawless v. Ireland (no. 3), 1 July 1961, Series A no. 3
Lebedev v. Russia, no. 4493/04, 25 October 2007
Lelièvre v. Belgium, no. 11287/03, 8 November 2007
Letellier v. France, 26 June 1991, Series A no. 207
Lloyd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nos. 29798/96, 30395/96, 34327/96, 34341/96, 35445/97, 36267/97, 36367/97, 37551/97, 37706/97, 38261/97, 39378/98, 41590/98, 41593/98, 42040/98, 42097/98, 45420/99, 45844/99, 46326/99, 47144/99, 53062/99, 53111/99, 54969/00, 54973/00, 54997/00, 55046/00, 55068/00, 55071/00, 56109/00, 56231/00, 56232/00, 56233/00, 56429/00, 56441/00, 2460/03, 2482/03, 2483/03, 2484/03 and 2490/03, 1st March 2005
Lobanov v. Russia, no. 16159/03, 16 October 2008
Luberti v. Italy, 23 February 1984, Series A no. 75
M. v. Germany, no. 19359/04, ECHR 2009
Mahdid and Haddar v. Austria (裁定), no. 74762/01, ECHR 2005-XIII (extracts)
Mamedova v. Russia, no. 7064/05, 1 June 2006
Mancini v. Italy, no. 44955/98, ECHR 2001-IX
Mangouras v. Spain [GC], no. 12050/04, ECHR 2010
Marturana v. Italy, no. 63154/00, 4 March 2008
Matznetter v. Austria, 10 November 1969, Series A no. 10
McKay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no. 543/03, ECHR 2006-X
McVeigh and Others v. United Kingdom, nos.8022/77, 8025/77, 8027/77, Commission report of 18 March 1981
Medova v. Russia, no. 25385/04, 15 January 2009
Medvedyev and Others v. France [GC], no. 3394/03, ECHR 2010
Meloni v. Switzerland, no. 61697/00, 10 April 2008
Michalák v. Slovakia, no. 30157/03, 8 February 2011
Minjat v. Switzerland, no. 38223/97, 28 October 2003
Mogos and Others v. Romania (裁定), no. 20420/02, 6 May 2004
Molotchko v. Ukraine, no. 12275/10, 26 April 2012
Monnell and Morris v. the United Kingdom, 2 March 1987, Series A no. 115
Mooren v. Germany [GC], no. 11364/03, 9 July 2009
Morsink v. the Netherlands, no. 48865/99, 11 May 2004
Mubilanzila Mayeka and Kaniki Mitunga v. Belgium, no. 13178/03, ECHR 2006-XI
Murray v. the United Kingdom, 28 October 1994, Series A no. 300-A
Musiał v. Poland [GC], no. 24557/94, ECHR 1999-II
Musuc v. Moldova, no. 42440/06, 6 November 2007
N.C. v. Italy [GC], no. 24952/94, ECHR 2002-X
Nart v. Turkey, no. 20817/04, 6 May 2008
Nasrulloev v. Russia, no. 656/06, 11 October 2007

Năstase-Silivestru v. Romania, no. 74785/01, 4 October 2007
Navarra v. France, 23 November 1993, Series A no. 273-B
Nechiporuk and Yonkalo v. Ukraine, no. 42310/04, 21 April 2011
Neumeister v. Austria, 27 June 1968, Series A no. 8
Niedbala v. Poland, no. 27915/95, 4 July 2000
Nielsen v. Denmark, 28 November 1988, Series A no. 144
Nikolov v. Bulgaria, no. 38884/97, 30 January 2003
Nikolova v. Bulgaria [GC], no. 31195/96, ECHR 1999-II
Nikolova v. Bulgaria (no. 2), no. 40896/98, 30 September 2004
Novotka v. Slovakia (裁定), no. 47244/99, 4 November 2003
Nowak v. Ukraine, no. 60846/10, 31 March 2011
Nowicka v. Poland, no. 30218/96, 3 December 2002
O.H. v. Germany, no. 4646/08, 24 November 2011
O'Hara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37555/97, ECHR 2001-X
Osypenko v. Ukraine, no. 4634/04, 9 November 2010
Öcalan v. Turkey (裁定), no. 46221/99, 14 December 2000
Öcalan v. Turkey [GC], no. 46221/99, ECHR 2005-IV
Oral and Atabay v. Turkey, no. 39686/02, 23 June 2009
Panchenko v. Russia, no. 45100/98, 8 February 2005
Pankiewicz v. Poland, no. 34151/04, 12 February 2008
Pantea v. Romania, no. 33343/96, ECHR 2003-VI (extracts)
Paradis v. Germany (裁定), no. 4065/04, 4 September 2007
Piotr Baranowski v. Poland, no. 39742/05, 2 October 2007
Piotr Osuch v. Poland, no. 30028/06, 3 November 2009
Piruzyan v. Armenia, no. 33376/07, 26 June 2012
Prencipe v. Monaco, no. 43376/06, 16 July 2009
Quinn v. France, 22 March 1995, Series A no. 311
R.L. and M.-J.D. v. France, no. 44568/98, 19 May 2004
R.M.D. v. Switzerland, 26 September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VI
Rahimi v. Greece, no. 8687/08, 5 April 2011
Rakevich v. Russia, no. 58973/00, 28 October 2003
Rantsev v. Cyprus and Russia, no. 25965/04, ECHR 2010 (extracts)
Rehbock v. Slovenia, no. 29462/95, ECHR 2000-XII
Reinprecht v. Austria, no. 67175/01, ECHR 2005-XII
Riad and Idiab v. Belgium, nos. 29787/03 and 29810/03, 24 January 2008
Riera Blume and Others v. Spain, no. 37680/97, ECHR 1999-VII
S.B.C.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39360/98, 19 June 2001
S.P. v. Belgium (裁定), no. 12572/08, 14 June 2011
Saadi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13229/03, 11 July 2006
Saadi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no. 13229/03, ECHR 2008
Sadegül Özdemir v. Turkey, no. 61441/00, 2 August 2005
Sakik and Others v. Turkey, 26 November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VII
Salayev v. Azerbaijan, no. 40900/05, 9 November 2010
Sanchez-Reisse v. Switzerland, 21 October 1986, Series A no. 107
Sarigiannis v. Italy, no. 14569/05, 5 April 2011
Schiesser v. Switzerland, 4 December 1979, Series A no. 34
Schwabe and M.G. v. Germany, no. 8080/08, 1 December 2011
Scott v. Spain, 18 December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VI
Selçuk v. Turkey, no. 21768/02, 10 January 2006
Shabani v. Switzerland, no. 29044/06, 5 November 2009
Shamayev and Others v. Georgia and Russia, no. 36378/02, ECHR 2005-III

Shamsa v. Poland, nos. 45355/99 and 45357/99, 27 November 2003
Shimovolos v. Russia, no. 30194/09, 21 June 2011
Shtukaturov v. Russia, no. 44009/05, ECHR 2008
Shulgin v. Ukraine, no. 29912/05, 8 December 2011
Skrobol v. Poland, no. 44165/98, 13 September 2005
Smirnova v. Russia, nos. 46133/99 and 48183/99, § ..., ECHR 2003-IX (extracts)
Soldatenko v. Ukraine, no. 2440/07, 23 October 2008
Solmaz v. Turkey, no. 27561/02, 16 January 2007
Stanev v. Bulgaria [GC], no. 36760/06, 17 January 2012
Stašaitis v. Lithuania, no. 47679/99, 21 March 2002
Steel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23 September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VII
Stephens v. Malta (no. 1), no. 11956/07, 21 April 2009
Stephens v. Malta (no. 2), no. 33740/06, 21 April 2009
Stepuleac v. Moldova, no. 8207/06, 6 November 2007
Stoichkov v. Bulgaria, no. 9808/02, 24 March 2005
Storck v. Germany, no. 61603/00, ECHR 2005-V
Sulaoja v. Estonia, no. 55939/00, 15 February 2005
Svipsta v. Latvia, no. 66820/01, ECHR 2006-III (extracts)
Tepe v. Turkey, no. 31247/96, 21 December 2004
Tase v. Romania, no. 29761/02, 10 June 2008
Tiron v. Romania, no. 17689/03, 7 April 2009
Toshev v. Bulgaria, no. 56308/00, 10 August 2006
Toth v. Austria, 12 December 1991, Series A no. 224
Tsirlis and Kouloumpas v. Greece, 29 May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III
Țurcan v. Moldova, no. 39835/05, 23 October 2007
Vachev v. Bulgaria, no. 42987/98, ECHR 2004-VIII (extracts)
Van der Leer v. the Netherlands, 21 February 1990, Series A no. 170-A
Van Droogenbroeck v. Belgium, 24 June 1982, Series A no. 50
Varbanov v. Bulgaria, no. 31365/96, ECHR 2000-X
Varga v. Romani, no. 73957/01, 1 April 2008
Vasileva v. Denmark, no. 52792/99, 25 September 2003
Viorel Burzo v. Romania, nos. 75109/01 and 12639/02, 30 June 2009
Voskuil v. the Netherlands, no. 64752/01, 22 November 2007
Vrenčev v. Serbia, no. 2361/05, 23 September 2008
Waite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53236/99, 10 December 2002
Wassink v. the Netherlands, 27 September 1990, Series A no. 185-A
Weeks v. the United Kingdom, 2 March 1987, Series A no. 114
Wemhoff v. Germany, 27 June 1968, Series A no. 7
Winterwerp v. the Netherlands, 24 October 1979, Series A no. 33
Witold Litwa v. Poland, no. 26629/95, ECHR 2000-III
Włoch v. Poland, no. 27785/95, ECHR 2000-XI
Włoch v. Poland (no. 2), no. 33475/08, 10 May 2011
X. v. Austria, no. 8278/78,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3 December 1979, D.R. 18, p. 154
X v. Belgium, no. 4741/71,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 April 1973
X v.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no. 1322/62,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4 December 1963
X v.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no. 6659/74,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0 December 1975
X v. Germany, no. 8098/77,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3 December 1978, D.R. 16, p. 111
X v. Switzerland, no. 8500/79,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4 December 1979, D.R. 18, p. 244
X v. Switzerland, no. 9012/80, Commission decision of 9 December 1980, D.R. 25, p. 213
X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6998/75, Commission Report of 16 July 1980

X v. the United Kingdom, 5 November 1981, Series A no. 46
Yankov v. Bulgaria, no. 39084/97, ECHR 2003-XII (extracts)
Yoh-Ekale Mwanje v. Belgium, no. 10486/10, 20 December 2011

}